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9月30日第161期

### 本期目录

#### 【重庆武斗专辑 7】

##### 生逢乱世

陈鸿娟 “5·31”——那无法醒来的噩梦

何清福 1967年夏秋的血与火

管小俊 两位母亲搭救“俘虏”

章孟杰 艰难与恶心的返乡路途

##### 书海泛舟

郭久麟 遭遇武斗（《文学朝圣之旅》选读）

何蜀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新增内容选读

---

#### 【生逢乱世】

### “5·31”——那无法醒来的噩梦

陈鸿娟

静静的墓园里，只有我们兄妹三人落寞的身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投在那已有些许破败的墓碑上，让那一座座被岁月遗忘的墓碑更加凸显出灰暗的斑驳与难以掩饰的悲凉。我们默默地向墓地深处走去，深怕惊动了在九泉之下沉睡了四十多年的亡灵。这一个个消失在瞬间的鲜活生命似乎有些孤寂。岁月渐渐远去，只有满园的萋萋青草和点点黄花在忠实地陪伴着他们，一年又一年。

有谁能看得出，就在重庆市三十五中合葬墓右侧，那被浓密藤蔓缠绕的草叶丛中还有一座坟茔，同样掩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只有他的亲人和同学知道这个年轻的生命在身陷暴行中时那无助的眼神、绝望的呼喊和痛苦的挣扎，只有他的

亲人和同学还记得起那血腥悲惨的一天……

轻轻地，我们将一束鲜花放在这蓬藤草丛间，用饱含着血泪的记忆再次拉开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那天是端午节，又恰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大早，薄雾还未散去，就见两派的“造反派战士”及“革命群众”集结队伍唱着歌，高呼着口号，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从我家门前走过，分别向八一五派的主会场解放碑及反到底派的主会场大田湾体育场进发。

我们起了个大早，为这即将恢复“太平”的山城激动不已。四哥和他的同事邀约当时还未起床的五哥一起去看热闹，五哥说了句“今天哪里也不准备去”后，即到门外看队伍。这时，三十五中的周老师又来邀五哥进城，他也谢绝了。恰好三十五中八一五派的队伍也从门前经过，同学们在队伍中招呼他一起走，他也摆摆手再次谢绝，即回屋翻看起一本乐谱来。不一会儿，姐夫与他的建设厂八一兵



团的朋友老徐来家中取120照相机，去解放碑为自己的八一五派拍照准备资料，再次约五哥一起去。爱好摄影的五哥终于答应一同前往，连早饭都未吃，空着肚子就与他俩走了。姐夫是空压厂八一兵团的宣传员，负责拍照，是有任务在身，五哥则纯粹是跟着去看热闹。谁会料到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五哥陈鸿康（见左图），品学兼优，参加了三十五中的八一五派组织，除参加一些文艺宣传演出外，没有参加其它活动，更未涉及过武斗。那天省革委的成立，对于经历了一年多武斗之苦的重庆市民来说无疑是个大喜的日子，无论是反到底派还是八一五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大联合，它不但标志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也让饱尝武斗之苦，渴望平静、安宁生活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两派队伍在两路口交汇，拥挤得人山人海。四哥因两路口拥堵不堪，上午十点多钟就回到了家中。这时，五哥、姐夫和老徐步行至鹅岭重庆警备区门口，恰

好碰到建设厂八一兵团的一辆大卡车（据说这辆车参加过武斗，五哥却全然不知），因老徐认识车上的人，便招呼他们一起搭车前往解放碑。车没行多远，大概在两路口三十中及原图书馆附近，前面已经拥挤不通，车只能在汹涌的人海中缓缓前行，五哥见状对姐夫说：“我们下车走吧。”但姐夫估计不到前面是怎么回事，只说了一句“滑到哪里算哪里”。当车行至原缆车站（现在的皇冠大扶梯附近），车被人海彻底淹没，再也无法前进。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高音喇叭大喊：“大卡车压倒人了！”加之一些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将人们一触即发的情绪轰然点着。一群有备而来的人，扯下旗帜，旗杆就是钢钎，拆开语录牌，框架就是棍棒，暴徒们就用这些钢钎和棍棒作武器，还没等车上的二十几个人反应过来，这群人已经扳倒了卡车车厢周围的挡板，不由分说对着车上的人就是一阵乱劈乱捅乱打，顿时窄窄的一方车厢立即陷入了灭顶之灾。车上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暴行毫无招架之力，疯狂的施暴者对着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肆无忌惮地下手，而身背照相机的五哥则成了重要打击目标——他身背的照相机被硬说成是手枪！混乱中，姐夫叫五哥“护好脑壳”，五哥此时头部已受重伤，呻吟说：“我的头好昏哟！”面对车上受害人的一片哀号，痛苦挣扎，涌动的人海中，无人敢站出来对受害人施以援救，也没人敢上前说句公道话。施暴者们人性沦丧，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轮又一轮地持续着。照相机在混乱中也不翼而飞。姐夫在一位好心人的掩护下乘乱而逃——其实，群众心中有正气、眼里有是非，只是在高压的政治背景下及残酷的暴力面前敢怒不敢言！

身负重伤的五哥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施暴者们还将已经陷入昏迷的五哥拖到反到底派的据点——体育场内继续施暴。更有丧心病狂者，竟用刺刀刺向他的左肋间！可怜手无寸铁、全然不知就里的五哥终被打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

据说，大田湾体育场主席台上的广播喇叭曾一遍遍地广播着寻人启事，叫人去认领重伤的五哥。在场的警备区首长“范九号”见五哥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急命人将他送到离体育场最近的第一工人医院（现重庆市急救中心前身）抢救。

此时已经逃脱的姐夫拼命地跑到解放碑我五爸家报信。已是中午时分，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刚巧爸爸也在，他们见到了跌跌撞撞、惊魂未定、脚上只剩下一只鞋的姐夫，知道情况后丢下碗筷便四处打听、寻找。重医附二院、外科医院、市三人民医院……最后，爸爸断定，书生气十足的儿子伤后一定会被送到当时反到底派的第一工人医院，又急忙赶到那里，一间间病房去找、一遍遍向人打听，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儿子穿过的劳保皮鞋，并见到了正被抬向救护车且昏迷不醒的儿子，爸爸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缠绷带、满脸是血、满身是伤的人是自己的儿子！在场的一位医生告诉爸爸：伤者因颅骨骨折引起颅内出血，需要立即

开颅手术，必须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重医附一院救治（重医附一院当时也属于反到底派控制的医院）。

也是中午时分，在家中的妈妈和我的其他兄姐接到老徐送来五哥被打成重伤的消息，也急切地前往其它医院寻找。大坪医院里满是伤员，却不见五哥的身影，坐立不安的我走到大门外，在马路边焦急地翘首望着往来的车辆和行人，期盼着五哥能够平安回家。这时天色阴暗，像要下雨的样子。早上还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锣鼓喧天的马路上现在却人车寥寥，死气沉沉。

直到下午五点钟左右，远远地看见一辆救护车驶来，透过车窗，爸爸焦急地向我招手，我飞跑过去，只见爸爸大声地说着什么，并急切地用手向前方比划着。无奈救护车飞驰而过，我什么也没有听清。我赶紧跑回家将情况告诉家人，正当大家在分析爸爸的意图时，爸爸气喘吁吁地跑进门，大声说：“老五在重医需做手术，缺血，快快快！”

然而，当我们全家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准备给五哥输血时，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了……

如同五雷轰顶的妈妈一下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五哥的同学把她背回了家。手术室外，一个黑脸膛、身材不高但较壮实的年青汉子一边摇着手中的眼镜，一边幸灾乐祸地说着：“死了，死了！”

早上还青春阳光的儿子，出门前跟妈妈说今天是端午节，想吃妈妈做的回锅肉，炒点苋菜。看着儿子爱吃却再也不能吃的菜，妈妈再次悲痛得不省人事。更令我们全家人不能接受和痛心的是，在抢救五哥生命的危急关头，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派性挑拨，聚集在手术室门外，大声叫嚷着：“不许抢救狗崽子！”……

医生告诉我们，五哥全身共有三处开放性创伤：颅骨骨折造成颅内大面积出血、被刺的左肋处形成气胸、下身血肉模糊。但致命伤还是在头上，加上时间耽误太久，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亡。

五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三十五中的同学们冒死从对立面——重医附一院反到底派手中抢回了五哥的遗体，在学校里为他操办了隆重的善后事宜。当我们再次见到五哥时，他已是头上满缠着绷带，全身上下青一块肿一块，并布满了鸡皮疙瘩。五哥的遗体分明在告诉我们：他受的不仅仅是皮肉伤，那满身的鸡皮疙瘩是他内心极度恐惧而导致的生理反应，让我们至今都无法释怀。

灵堂一角，几个女同学在陪着妈妈垂泪，而爸爸更是因为自己在“反右”中的“过失”而断送了子女们的前程、爱子在垂危之时还被人骂成“狗崽子”而自责不已，老泪纵横，拉着儿子冰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抚摸着五哥僵硬冰冷的身体，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广播里反复播送着用毛主席诗词谱曲的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当年群

众组织都以此歌曲作为追悼“烈士”时的哀乐)，曲子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回转，让人撕心裂肺。五哥的同学用清水为他擦净了满是伤痕的身体，揩干净了身上的斑斑血迹，再用白绸裹身，穿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军装。木工师傅为他赶做了棺木入殓，并在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中的三十五中合葬墓右侧用水泥修建了一个单墓，墓顶上立了一块约两米高的墓碑。

七天后，同学们在工业学院（现杨家坪重庆工学院）为五哥和在那天一同遇害的建设厂胡思应举行了追悼会，在全市发布了讣告，随后在沙坪公园下葬。三年后，墓碑被拦腰折断，后经修复，但最后还是不知去向了。

在“5·31”之后的几天里，那辆出事的卡车仍然耷拉着车厢挡板，孤零零地停在出事地点，仿佛在向路人控诉着那光天化日下的暴行，诉说着被害人的无辜和冤屈。

五哥的突然离去，瞬间打破了我家的平淡生活。他多才多艺，喜欢各种乐器，常在家中与几个哥哥合奏。虽然家里生活清苦，却充满了乐趣。五哥的离去就像带走了家人的魂，也带走了亲人的快乐。从此，家里再也听不到琴声。

我母亲如同死而复生地大病一场，由此引起的高血压病终生不治，老年后也因高血压心脏病去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做了一件深明大义的事：当时三十五中的八一五派同学义愤填膺，一定要采取行动为五哥报仇，“讨还血债”。学校的周校长见状找到我妈妈，希望妈妈出面平息事态。知书达理的妈妈强忍着失去儿子的巨大悲痛，对同学们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不愿意你们的妈妈再失去你们……”母亲带着滴血的心，却用博大的胸怀抚平了同学们的狂躁与冲动。

多年后，清理“三种人”时，重庆电线厂的调查组曾到三十五中，对“5·31”血案进行调查，告知有人揭发他们厂里有一个人那天在两路口打过人。时间、地点及过程都吻合，我们本以为五哥的冤屈能得以大白于天下。但最后却得知那人分辩说：“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打，一片混乱，为什么就认定是我打死了呢？”之后调查就没有结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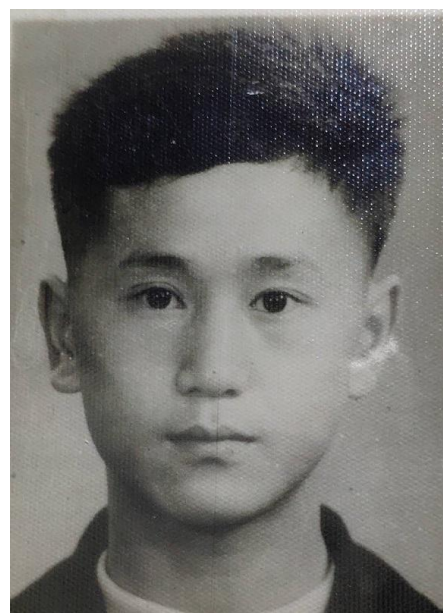
五哥罹难后，当时警备区的首长表示对“5·31”事件一定要追查到底。但后来五十四军与十三军换防，这事也就无人理睬了。二哥曾去北京上访过，有关部门责成当地革委会及驻军调查解决。二哥回重庆后，和四哥一起到警备区接待处，说明情况并递上材料。接待他们的军代表竟没听他们说完就大发雷霆，说什么：你们瞎说，明明是6月2日（市革委成立日）发生的事，你们偏说是5月31日，别有用！……那位军代表自己没弄清楚情况，把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大会时也发生过的打架斗殴事件与“5·31”事件混为一谈，粗暴地拒绝了受害家属的申诉。在那个黑白颠倒、有理难清的年月里，二哥只好拉着四哥忍

气吞声地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也就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

五哥含冤九泉，死不瞑目。时过境迁，谁是当年的凶手已不重要，因为他们与死者都是受害者。在那段荒谬而疯狂的年代，造就了大批蒙昧而狂热的人。这场运动利用了他们的单纯与幼稚、热情与愚忠，“文攻武卫”又挑起群众斗群众，频发的人间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些往事并不如烟，“5·31”那挥之不去的梦魇给五哥的亲人带来无尽的伤痛。那道留在心中看不见却永不会愈合的伤口浸透着殷殷鲜血、痛入骨髓。

踏着地上的落叶，兄妹们走出了墓园。如今，这座全国唯一的、最完整的“文革”墓群已批准为重庆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让这群无辜的死难者有了永久的安眠之地，更能让来此凭吊的人们警醒和反思。（右图：陈鸿康遗像。）



五哥如果健在，应是年近古稀的小老头了。但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那个俊朗、帅气的阳光小伙子。他当年的同学们，有的成了大学的管理干部，有的当了企业的党委书记、公司的老总，有的已经出国……在他们的同学聚会时，永远不会有五哥的身影……墓园围墙后，可以看到教堂尖尖的楼顶上竖立着高高的十字架，它无时无刻都在俯视着这群“无辜的羔羊”。隐约中，我仿佛听见了古老的管式风琴在弹奏着“安魂曲”……

不知在天堂里，可有我那多才多艺的五哥展露才华的舞台？

2017年3月20日

---

【生逢乱世】

## 1967年夏秋的血与火

何清福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的文革路》。作者当时是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学学生。四十三中学的前身是民国时期以招收国民政府兵工



署第二十工厂（即后来的长江电工厂）职工子弟为主的“川益中学”，该校学生95%以上都是长江电工厂职工子弟和该厂所在的铜元局地区平民子弟。

作者简介：何清福，1949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初中毕业生，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参加造反，属反到底派。后当过下乡知青，1972年“顶替”退休的父亲招工到长江电工厂当工人，1973年推荐到重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厂技术科任职，后为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第三届感应热处理技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右图为作者近照。）



### 红旗街的广播站攻防战

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因对革联会是“保”还是“砸”的对立态度分裂成“保派”和“砸派”两大派后，两派打起了口水仗，其有力武器就是广播站，而且广播站往往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城里闹市区，只要有可能，你“砸派”有一个大喇叭，我八一五必在附近也建一个大喇叭唱对台戏，反之亦然。如果只有一方有广播站的，这个广播站就会遭到不断攻击。

5月，长江电工厂所在的南岸铜元局地区“砸派”也建立起一个名为“红旗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广播站”（红旗街是铜元局文革“破四旧”时起的新名称）。广播站设在长江厂东大门不远的老君庙街口一座两层楼房的楼上，楼面对铜元局工矿贸易商店，中间隔着一条街道公路，是铜元局的中心区域。这座楼房属铜元局商店所有，每层楼只有一间屋，一楼是小面馆。铜元局商贸系统是“砸派”掌权，造反派负责人王兴忠（外号王麻子）提供广播器材和这间房子作为广播站。

广播站开播后在铜元局影响很大，被八一五派视为眼中钉。6月5日凌晨2时，八一五派的四十三中“11·27”的“钢鞭”战斗组首次对联合广播站进行了攻击。此后对广播站的攻击不断。19日晚至20日晨，重大八一五、长江厂八一兵团唆使王杰小学（川益小学）的“王杰兵团”（小学生）围攻广播站，用弹弓击伤我校“五七部队”勤务员简光辉眼部，后送往市三院医治。20日晚，“11·27”、“王杰兵团”再次围攻广播站，他们扔石块、砖头，用弹弓射击，直到早晨6点钟左右才离去。

为了维护铜元局地区的稳定，6月21日长江厂红旗街地区由长江电工厂军事代表室（简称军代室）出面成立了一个“红旗街地区制止武斗小组”，由驻厂军代表周筛任组长，我作为四十三中“五七部队”代表参加小组工作，但由于重庆武斗已成燎原之势，这个小组对维持地区稳定已无能为力。

6月23日晚7时许，长江厂八一兵团近百人冲入长江电工厂职工医院一门诊室，抓走七医大（代号后字245部队）“105”战士3名，重庆市三中“冲锋号”战士4名，并抢走衣物被盖等物品。天黑后，八一五派又向我们广播站发动攻击。他们在广播站对面商场的石台上架起长条凳做成的巨型弹弓，以鸡蛋大的鹅卵石向广播站射击。凌晨3点30分左右，“11·27”作主力发动进攻，我用广播向“11·27”提出强烈抗议，此时一颗小弹弓弹丸穿过窗户上复铜片孔（冲压弹壳料后带圆孔的钢片）击中我颧骨，险些击中眼睛，这是我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受伤。凌晨4时许，八一五派的弹弓击伤了“五七部队”贺保全的左眼，致使其左眼完全失明。

6月24日，人们传说长江八一兵团若攻不下“砸派”广播站，就准备罢工，一时工厂人心惶惶。傍晚，八一五派在职工三食堂附近搬运锄把、扁担、木棒等武斗凶器，来助战的重庆石油学校大庆公社武斗人员也来到了铜元局。夜十时左右，八一五派开始断断续续用石头、砖块向广播站发起攻击。27日下午，八一五派又到日杂商店抬了两捆锄把、扁担到老君庙街尽头的王杰小学。当晚11点40分左右“王杰兵团”等又断断续续向广播站扔石头砖块。6月28日深夜1点50分，铜元局八一五派突然向广播站发起猛烈攻击，大块的石头、砖块向广播站砸来。凌晨3点左右，铜元局八一五派封锁了各个路口，调来“11·27”几十人，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木棒参与了对广播站的攻击。4点左右他们开始了大规模攻击，从老君庙街民房顶爬到我们广播站房顶上，打碎房瓦，从木条椽子缝隙向下扔石头、砖块、瓦片，高叫“看你龟儿子投不投降”。后来他们弄断了几根椽子，一个“11·27”成员率先钻过缝隙跳下来，立即遭到我方劈头一阵乱棒打翻在地，房顶上的人见状不敢再下来了。5点半左右，进攻者看天快亮了，才陆续撤退。此时广播站内一片狼藉，头上房瓦几乎无存，地板上堆满碎瓦片。在1967年时塑料凉鞋才上市不久，还比较金贵，父亲勤俭节约给我买的一双圆包头黑塑料凉鞋也在这次武斗中丢掉了。武斗结束，我方重伤三人，轻伤二三十人。对方伤者中“11·27”进入广播站内那个被打得最重，头部满是污血块，送到军医大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否则他将是铜元局武斗死的第一人，事后得知他是我校初一年级的小同学石俊林。

那天上午十时左右，铜元局制止武斗小组叫长江厂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的伤员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治，在南坪厂区（长江电工厂分铜元局老厂区和南坪新厂区两部分）被八一兵团设路障拦住，在惠工机床厂又被拦阻一次。车到李



家沱，重庆水轮机厂八一五派从楼房顶上扔砖头又砸伤四五人……

### 参观“完蛋就完蛋”广播站

当时重庆最有名的是解放碑“砸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它名字来源于林彪的一段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解放碑坐落在重庆最繁华的市中心区十字街口正中，解放碑是原国民政府为抗战胜利建的纪念碑，时称“抗战胜利记功碑”，1949年后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完蛋就完蛋”广播站



所在的交电大楼，就在离解放碑不远的邹容路大马路旁边，该大楼建于50年代初，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层大楼，夹在三八商店（重庆百货大楼）与大众游艺园之间。（上图：解放碑地区当时主要建筑分布示意图。图片下方马路邹容路两边的东方红电影院与交电大楼分别设有八一五和反到底派的广播站。）

广播站播音室设在四楼，几个8瓦高音大喇叭安装在房顶上。只要一广播，交电大楼前的马路就被成百上千的听众塞满。为与砸派抗衡，八一五派在交电大楼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原和平电影院）也建立了个东方红广播站，对“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进行干扰。和平电影院前身为抗战时期的国泰影剧院，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等曾在这里上演，周恩来也常在剧院出入。

“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播后，我校砸派“五七部队”派成员陈川元到广播站工作，广播站播出的重要最新内容我们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知。在陈川元的带领下，我和几个勤务组成员曾进入广播站参观过一次。

那时重庆武斗已进入“杀钢钎”阶段，为防八一五来端（攻占）广播站，交电大楼被建成了一座抗击武斗的堡垒，进出广播站的人都要严格盘问。交电大楼的底层是商场，楼上都是木地板木楼梯，上边三、四楼原来的木楼梯已被拆除，要临时搭木梯才能爬上去。四楼通往播音室等重要房间的走廊地板和房间地板都

已被拆除，只剩下一些空梁架，房间之间必须临时将木板搭在梁架上才能通行。楼上准备了大量砖头石块，钢钎藤帽，即或八一五攻进了大楼也难以上楼，居高临下的石块攻势，长长的钢钎长矛，进攻者没便宜可占。面临东方红电影院的窗口设有可关可开的防护板，窗后是用长条凳脚做成的巨型弹弓，弹弓射击时，把窗户防护板打开，大弹弓可把半块砖头射往对面，八一五用同样的弹弓在电影院房顶向广播站射击时，这边就将防护板关上。四楼四周所有的外墙窗户都采取了防护措施，整个广播站形如一个大箱子。需要撤退时可撬开楼后面封闭窗户的木板，用木板作桥搭上紧邻交电大楼的民房窗户即可迅速撤离。

但是“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这些防御手段只能应付钢钎长矛冷兵器。到了两派武斗升级为动枪动炮的热兵器阶段后，1967年8月13日凌晨，在八一五的持续进攻下，“完蛋就完蛋”很快就“完蛋”了，从东方红电影院齐射过来的枪弹打燃了四楼房间里的易燃物，整个交电大楼及周边房屋燃成一片火海，全部化为废墟。

## 重庆长江厂的“七二〇”事件

重庆1967年6、7月份武斗的特点是紧紧围绕兵工厂展开。

6月18日，重庆嘉陵机器厂（大型大口径枪弹兵工厂）八一兵团战士陈国寿在厂里为贴大字报与军工战士发生冲突，陈国寿被杀死，随后嘉陵厂八一兵团被军工赶出嘉陵厂。八一兵团野战司令部即派出专业武斗队200余人，以“武装护送群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为名，与嘉陵厂八一兵团武斗人员一道，占领了嘉陵厂家属区和厂职工医院。6月底，军工系统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大型枪械兵工厂）“砸派”军工井冈山与“保派”八一兵团6657团为争夺枪械总装车间发生武斗，八一兵团6657团失败。八一兵团野战司令部派出武斗队200多人前去增援，结果也未获胜。本来建设厂是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掌权，但在武斗中斗不过“砸派”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红大刀”，结果建设厂的重要部门逐步被砸派控制……

重庆两派围绕争夺兵工厂的武斗使重庆武斗急剧升级，人们强烈希望中央能解决重庆问题。7月中旬，重庆上空盘旋着直升机，听说是派来解决重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有直升机飞来重庆。直升机在鹅岭下五十四军军部营地起落，搅起的大团黄土尘烟在隔江的长江电工厂区清晰可见。

长江电工厂是个老厂，长江厂的前身是国民兵工署第二十工厂。1905年时由地方当局在此地建厂铸造钱币铜元，故厂区一带以铜元局为地名。1930年军阀刘湘在铜元局制造枪弹，改名为四川第一兵工厂，抗战时成为国民政府兵工署

第二十工厂，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的前身都是在抗战时由第二十兵工厂分出去的枪械分厂和大口径枪弹分厂。几十年人口的相对稳定，拿四川话说形成了“竹根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门不见开门见，人际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因此重庆的武斗搞得再凶，铜元局相对还是稳定的，虽然晚上可能相互扔砖块、石头，背后可能“塞冷锤”，但当面对面时还不至于拳头相见。因此铜元局的武斗，不借助外来力量是搞不起来的。

一支枪如果没有子弹，还不如一根钢钎。长江厂生产产品的特殊性，注定成为两派争夺的重点。

1966年9月首先来铜元局搞文革串联的是重大八一五牟礼富、文光智。1967年初为革联会造反派分裂成“保派”、“砸派”后，“保派”后字242部队“文筹”、总字421“红总”，“砸派”七医大“105”战斗队、重庆市三中“冲锋号”陆续来到铜元局，这些都不是武斗队伍。进入1967年6月下旬，“保派”的专业武斗队陆续进入铜元局地区，石油学校“大庆公社”、六中“32111”、红农八一五等，这些武斗队伍的进入，铜元局的武斗也随之升级。7月中旬末，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建设厂八一兵团武斗队潜来长江厂，造成重庆“七二〇”事件，由于这次事件使72万发56式枪弹流向社会，使重庆的武斗由冷兵器武斗一步跨入了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在武斗中不出名的长江厂、铜元局，一下子成为热点，八一兵团主要头目、八一五学生领袖都先后聚集到长江厂。

与往常一样，晚饭后我与吴纪白、何钊祥都要到铜元局联合广播站去走一趟。长江厂疏散区的广东山（与建设厂仅隔长江）到铜元局街上大约有2公里路程。7月20日晚由于我有其它事，故同吴纪白、何钊祥走到二所弯弯我就回来了。

“所”为原兵工署二十工厂编制，“二所”在广东山厂职工医院山梁下长溪沟的尾部，沟壑里藏着抗战时建造的枪弹合装（装配）和工具制造工房。谁也想不到近段时间“保派”的武斗挑衅，竟是今晚大规模武斗的预演。

夏日的7月，天亮得早，人也起得早，昨晚的武斗很快就传遍全厂。下面是我1967年7月21日日记（当时的派性语言保持原样，括号中是为后加的解释）：

昨晚，长江厂发生了反革命的“七·二〇”事件，长江厂八一兵团勾结外厂八一兵团来厂盗窃军火，乘军工长江兵团开会之际，武力围住了长江兵团，同时在黄葛湾码头抢窃军火——子弹。

这场反革命事件中，我校“11·27”充当了血腥镇压军工长江兵团，围攻、冲击国防厂矿的得力帮凶。“七·二〇”晚，以11·27头目王懋、唐永健等带领战士黄贵银等三四十人，手持大刀、木棒、长矛，对军工战士大肆屠杀，直到21日早晨9.30左右才回学校。

早晨，到了街上（铜元局），看见长江厂东大门、南大门戒备森严，都用石头、镪水坛（硫酸、盐酸）筑起了街垒，大门有手持钢钎、大刀，头戴藤帽，腰系马达皮带的武斗人员把守着。军工长江兵团已被赶出了长江厂，被俘军工战士几百人。东大门，我校 11·27 正组织了慰问队在慰问，他们瞧见我，都用惊奇、不怀好意的眼光瞧着我。街上（厂消防队、理发店处）正碰着八一兵团抓郭栓柱（长江厂原武装部长，军工战士），他牵着两个小孩在街上走，八一兵团武装人员去捉他，他看见后只身逃跑，八一兵团就追，他两个小孩嘶声叫着：“爸爸！爸爸！”街上的人不少落下了同情的眼泪。最后郭栓柱在后花园锻工房大门处被抓住。

晚上，厂广播开始作舆论工作，高呼：“长江军工砸匪被我赶出长江厂，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注意，砸匪几百人要在苏家坝渡河攻长江，希望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刹时，一群群“亡命徒”，拐着小脚，拿着火钩、火铲、叉棍（晾衣用具）、木棒……奔赴战场。原来这是长江八一兵团所属 7738 部队的一群不要脸、不要命的泼妇们兼勇士们。

以上是我 21 日当天所看到听到的实况。“11·27”看见我之所以感到惊奇，因为我是砸派“五七部队”头头之一，竟然此时还敢在街上露面。他们没立即点水（背后使坏）的原因，即或夜晚“11·27”与“五七部队”可以石块棍棒相见，但我们毕竟是“11·27”的元老，或者说，此时他们还根本没有抓我的思想准备，同时“五七部队”也从没对“11·27”做过出格的事，在感觉上还不是那样你死我活。

长江电工厂“七二〇”事件已过去几十年，有当年参与过此事件的人相继从自己所知的角度为历史作证：发生在长江电工厂的“七二〇”事件所导致 72 万发枪弹流失社会，促成重庆大规模热兵器战争，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长江厂八一五派青年女工黄荣华（后来当了市革委委员）回忆说：

我们八一兵团联合总部，根据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成立了相应的“作战指挥部”。……接着，厂里就陆续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都是外单位的八一五派战友，手里都拿着木棒、铁棍、钢钎。我不认识这些人，也没有去问过是怎么回事。往往是武斗打过了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参加武斗的人员。

七月二十一日清晨七点钟，厂广播站紧急通知：八一兵团全体常委马上到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我去后才知道，头天晚上，我们厂和空压、建设厂来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把我们厂的反到底派设在四科（厂军品研究所、技术科所在地，属机关四支部，故称“四科”）会议室的据点端掉了，我们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

叫我去配合医疗队，负责救护伤员的工作。

我们厂从“七·二〇”武斗之后，反到底派的许多人都逃离了工厂，厂子里也完全停止了生产。就在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口号的大字报出现在街上那天，又有一些生面孔出现在我们厂区，后来才知道是八一兵团总部的大人物阳增泰、方文正，重大的学生头头等人也都来过我们厂，开始我并不认识方文正，是当了市革委会委员，在开会的时候才认识他的（方文正是市革委会的常委），阳增泰是我听到人们叫他名字才知道的，当时他是很有名气的八一五派工人领袖。

……那天来到工厂里的那些人，都是全市八一五派的大头头们。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子弹生产厂，目的是策划“抢劫”军品库房的子弹。当时两派武斗已经进入了枪战时代，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已经拿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向外散发，武装反到底派。我们工厂是八一五派控制的，所以，全市其他八一五派的大头头们，就盯住了我们工厂，他们跑到工厂来搞里应外合“抢”子弹……（注：见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版，145—148 页）

阳增泰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如下叙述：

……我就调动人马，组织船只，由王朝达带队，罗良才带路，于 7 月 20 日去提货。

但是当天却没有提到。后来才知道，那天因长江电工厂里两派对立正厉害，小摩擦不断发生，我们去提货的人引起该厂反到底派的警惕，八一五派的人又不大好在那种局势下直接让我们提走子弹。我们去的人还与该厂反到底的人发生了摩擦。

第二天，7 月 21 日晚，我亲自出马，再次去长江厂提子弹。这次出动了三艘船：

401 号，装港口兵团 67 人，机械兵团 22 人，石油校大庆公社 70 人；

101 号，装三中抗大兵团和纺织兵团部分人员；

601 号，装八一兵团 35 人，石油校石油兵团 86 人，五一技校 78 人。

三艘船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朝达带队，乘坐 601 号到铜元局，佯攻反到底军工的广播站，声东击西，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我亲自带领 401 号直奔长江厂仓库所在码头。因当时既无手机又无电台，就由 101 号来对两边进行联络沟通。

我们的船靠岸后，上去的人说有两个民兵挡住不准进库房。我就走过去对那两个民兵说：‘伙计，你们辛苦了，你们暂时靠边休息一下！’并叫几个人把他

俩看起来，不准乱说乱动。我们船上的一百多人立即涌进仓库。管仓库的人已经得到该厂八一兵团头头的通知，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把仓库门打开，给我们指明了建设厂提货产品的堆放处。

就这样，大家一鼓作气，把堆放的 400 多箱 70 多万发子弹全部搬上了船。101 号见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任务，便去通知王朝达他们收兵返回。（注：见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版 86—87 页）

阳增泰的回忆与我的日记记载略有差异的是，我的日记表明：1）提子弹时间是 20 日夜至 21 日晨，而不是 21 日晚；2）军工长江兵团没有广播站，21 日早晨 7 点钟以前，“砸派”军工骨干及 30 余名四十三中“五七部队”人员都已被赶出了铜元局，故不存在 21 日晚“佯攻反到底军工的广播站”一事。

### “八八”海战时我糊里糊涂就上了战场

自铜元局地区军工长江兵团、四十三中“五七部队”这两支“砸派”主要力量被赶走后，铜元局就成了八一兵团的天下，也成了八一五派武斗难民的收容所。外单位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被“砸派”赶出单位的武斗人员也纷纷来到长江厂参加了护厂队（武斗队），厂区公路上载满武斗人员的解放牌卡车穿梭不断。食堂为这些人员提供饭食也忙得不可开交，远离铜元局的广东山职工二食堂（我们称二饭堂）也为这些武斗人员奔忙，不时有戴着藤帽手持钢钎的武斗人员押着卡车到二饭堂运馒头稀饭。我家就在离二饭堂不远的广东山小学旁，看见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武斗人员，不免心惊胆战，一听到家属区有汽车喇叭响就会心惊肉跳。

在战战兢兢中苦熬了几天，7 月 25 日，八一五攻打重庆市工业学校，首次动用了机枪等制式武器，虽说工业校与长江厂仅隔一条江一座山，长江地区却没听到什么枪炮声，但传来的消息足以使人害怕了。7 月 26 日，军工井冈山总部作出了一个动用建设厂库存枪支武装反到底派的决定，该决定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邓长春、李木森、周应古等签署，因“七二〇”事件撤往重医的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勤务员刘锡邦也在决定上签了字。

在长江电工厂发生“七二〇”事件的同时，湖北武汉爆发了“百万雄师”与支持他们的独立师官兵围攻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的“七二〇”事件，直接威胁到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安全，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报道全国各地驻军与造反派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抗议游行，这无疑为重庆已成燎原之势的武斗烈火再浇上一瓢油。此时重庆两派已无法



对是非对错进行冷静思考，狂热使双方都认为有中央文革肯定的“文攻武卫”撑腰，自己的“武卫”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暴力血腥代替了理智文明。

7月30日晚十点左右，像是大战役的统一行动，噼噼啪啪的枪声突然响彻长江两岸，“哒哒哒”的机枪声，“咔嚓咔嚓”的步枪声，像热锅炒着的豆子响个不停。这到底是武卫还是战争？！怎样文攻？怎样武卫？枪炮下还有文攻吗？枪炮声吓得人们不知所措，一下子所有民居的灯光就自然地熄灭了，人们生怕亮光会带来灾难，沿着长江边的广东山一带被黑暗笼罩，不时的枪声令人心惊胆战。老人讲，就是解放重庆也不曾有这样激烈的枪炮声。1949年11月解放重庆时我刚出生半月余，为躲避战乱，母亲抱着我到哑巴洞（九龙坡火车站所对长江南岸江边）孃孃处避难，而今枪声四起，黑灯瞎火的，嫂嫂生产正在月子头里，到哪里去躲！对这次吓人的枪炮声，我后来在重庆有关武斗历史的记载中看到，原来是望江厂派改装炮艇望江101号到建设厂领枪，途中与长江电工厂八一兵团对战。

自7月30日以来，重庆天天枪炮声不停。白天稍微好一点，晚上可真要命。每天天刚一黑，广东山及四周一片寂静，灯光再也没有了。路上没行人，偶尔开过的车子，满载的都是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简直比秋天灶鸡（蟋蟀）的低鸣还要阴森恐怖，还要凄惨。人们改变了生活习惯，晚上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脚”（床的下面），让床也成为“掩体”。无情的子弹带着凄厉的呼啸从头顶上飞过，人们自觉地感到床脚比床上要安全得多。八一兵团这几天晚上持枪到家属区抓人，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环境的恐怖，人为的恐怖，使人透不过气来，明天是否会抓到我头上呢？这环境不能再待下去了。

如果让他们抓去打一顿，我这“排骨”肯定经不起几枪托。经打听，知道“五七部队”被赶出铜元局后已到建设厂去了，同学吴纪白的妈妈也想知道儿子的安危，我和吴妈妈决定冒险也要到建设厂去一趟。要去杨家坪建设厂，最近的路是由大石盘（四十三中西北面长江边）过河，上去就是建设厂地盘，但洪水天已停渡。由铜元局坐轮渡过河，然后在两路口乘电车去谢家湾也近，但铜元局被八一五派霸占，不敢去冒这个险。最后只好选由李家沱过河到黄葛坪，再见机到建设厂。

8月8日一大早，我就同吴妈妈一起从广东山出发去建设厂。为防碰到八一五派武斗人员，我们选择走广东山职工医院旁的僻静公路，横穿过长江电工厂靶场前的公路即进入瓦厂湾、康家湾。靶场这段路是长江厂从东到西的主公路，武斗车辆不时出现在路上，危险最大，但只需几分钟就进入了康家湾安全区。爬过康家湾山坡就到了南坪公社罗家湾，这里是农村，八一五武斗队不会在这里出现。

我们快速由罗家湾经九龙寺到了长江边，长江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李家沱渡口。

在李家沱过河后，我们由九龙坡火车站沿成渝铁路向重庆站方向走到三孔桥处，经到鹅公岩电厂的公路走到岩坎上的建设厂厂区，下午1点钟左右到了建设厂第三栋宿舍，经打听，四十三中“五七部队”的人驻守在长江边一个山头上。那里是建设厂的一个居民点，大概有四五户人家形成一个带院坝的小院。可能那几家是八一五派的吧，都逃难走了，只有一陈姓妇女和她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留守看护小院。在长江厂“七二〇”事件中，部分“五七部队”成员随逃出的长江军工井冈山成员一道撤到了重庆医学院，因为军工井冈山总部设在重医。不久按军工井冈山总部安排，“五七部队”勤务组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即将30多名五七部队成员组成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独立排，就驻扎在这个院子里。这里隔江就是长江电工厂疏散区，长江厂的旁街子到黄葛湾一带就连在公路上走动的人影都可看见。为防长江厂方向的八一五派渡江偷袭，独立排还在院子旁岩坎边上修筑了战壕，昼夜都有独立排战士持枪站岗。

下午我和吴纪白沿上午我们来时的路送走纪白妈，回到驻地已是七、八点钟。突然对岸沿长江边一带枪炮声骤起，隔江远望，长江下游黄沙溪方向一只拖轮在前，一艘登陆艇在后向上游驶来，长江厂岸上的枪炮一齐朝船上打，船上的枪炮也向岸上还击。由于事先没接到建设军工井冈山指挥部的通知，对这突发的战斗，独立排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既然长江八一五要打它们，那么这就应该是我们的船了。枪声就是命令，很快在简光辉、彭家荣的指挥下，独立排人员和12.7高射机枪就进入了阵地，一齐向对岸射击。我因刚到，还没熟悉这里的情况，外号“敢子”的简光辉就给了我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些子弹，糊里糊涂就上了战场。

在兵工厂长大的孩子，再加上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看战争电影，只要稍一示范，也就能摆弄枪支了。我蹲缩在战壕里不敢伸出头，好像每一颗子弹都是朝自己打来的。后来胆子稍大了一些，才敢将头伸出一点点，让眼睛刚好能从战壕边缘望出，心里还是“咚咚”地跳个不停。第一枪是怎样打响的已记不得了，总之开始只是胡乱地开枪壮胆。

天已麻黑，江上一边航行一边还击的船已快抵达山头下长江北岸的建设厂码头，昏暗中长江厂枪炮射击点的火光隐约可见，我们的12.7机枪和步枪一齐向这些闪光点射击，船上的炮也向这些点射击，长江厂岸边的枪炮声渐渐没有了。这一仗直到天黑尽才结束。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望江厂邓长春指挥的“金猴”给我们送物资来了。这就是重庆的“八八海战”！当时我同班同学吴文忠就在船上，但是他在登陆艇船舱里，外边发生的事他无法看到，提供不了详细的回忆。

## 我身边第一个阵亡的同学

被赶到建设厂的南岸铜元局这三十几个人，来源于好几个单位：洪永福（老农民）、黄朝富（傻班长）来自南坪农民造反军，文忠兴（文驼背）来自铜元局财贸九二一，梁春生（豆腐脑）、张世元（缺牙巴）来自铜元局红旗民中，四十三中“五七部队”人最多，没有一个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的人，只是在武斗快结束时，一个长江军工的余志和因受伤后在重医治疗，伤好后来过独立排，但很快就离开了。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他们来到建设厂后，组建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独立排，组成人员为：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女）、石孝殊（四十三中老师）、杜德裕、何钊祥、文忠兴、黄朝富、洪永福、蒋珍秀



在重庆建设机床厂疗养院（黄葛树）守防

（女）、简功桂（女）、庞德秀（女）、李章惠（女）、黄翠莲（女）、何树清、何清福、龙腾祥、麦志荣、李金生、赖思放、梁春生、张世元、毛长富、张国平等，还有两个不记得姓名只记得外号的女生“大肥”、“二肥”。独立排虽只有三十多个人，但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给独立排配置的武器却令人羡慕：12.7 高射机枪（使用弹丸直径为 12.7mm 的防低空飞机机枪，可仰射亦可平射，有效射程 3000 米，简称高机）一挺，五七式重机枪（带双轮和防护钢板机枪）一挺，“三无”冲锋枪一支，全自动步枪一支（全称 56 式全自动步枪），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101 步枪，全称 56 式半自动步枪）。12.7 高机射手是杜德裕、梁春生、张世元，五七重机枪射手是吴纪白、何钊祥。“三无”式冲锋枪由简光辉使用，这是特种部队配置的新式武器，射击时无声、无光、无烟，该枪种文革前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送给周总理，文革初才刚由建设厂仿制成功。全自动步枪也叫 102 步枪，既可以半自动点射，也可像冲锋枪一样连发，必要时将枪上刺刀打开插入地下就可像班用轻机枪一样扫射，由何钊祥使用。独立排的驻地叫黄葛树，驻地不远的坡

下处是建设厂的子弟小学，我们吃饭就在离子弟小学不远的职工食堂。当时建设厂处在八一五包围之中：东南面是八一兵团占领的长江电工厂，隔着长江与建设厂对峙，西面是八一兵团占领的空压厂，北面是八一五的战略据点重庆工业学院，东面是八一五的钢杆武斗队重庆机械制造学校。被八一五包围的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生活十分艰难，外面物资运不进来，蔬菜基本没有。8月3日清晨，九一纵队红一连（由南温泉、土桥、李家沱一带中学生组建）去进攻建设厂弯弯大楼对面被八一五占领的一处军需仓库，占领并获得很多军用牛肉罐头，这就是食堂天天的下饭菜。在这次行动中，红一连付出了好几条生命，其中包括九一纵队司令、红一连连长王木全。望江厂“军工井冈山舰队”的到来，给建设地区的反到底送来大量生活物资：大米、猪肉、涪陵榨菜、泸州老窖酒、香烟等，大概“舰队”又在长江上拦得往城里运菜的冬瓜、南瓜船吧，自此建设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独立排也分到烟和酒，但我们学生都不抽烟，犒劳了农民造反军几个兄弟。酒大家想喝，“敢子”怕酒后出事不允许喝，有人偷着开了一瓶泸州大曲，几个刚喝了几口就因酒的奇香被发现而禁止。“敢子”干脆将酒瓶敞开放在住房的柜子上，让酒香四溢，我们睡在地铺上人人都能尽情享受，那半瓶酒搁在那里直到武斗结束。以后的年月，再也没有闻到这么香的曲酒了。

我们吃饭的食堂在厂区的公路边，地势比较开阔。食堂西面一两千米外是空压厂的一座高高的山堡，山堡被红砖高墙围着，山堡上能俯视大半个建设厂和食堂，这里是空压厂的靶场，叫“天鹅宝蛋”。空压厂八一兵团居高临下，他们不时从砖墙上开出的枪孔向建设厂打冷枪，兵工厂转业军人多，其中不乏神枪手，建设厂军工不少人平白无故在公路上被空压厂射手击中。在一次吃饭时，独立排毛长贵肩挎的步枪枪托被冷枪击穿，若再偏一点就打着大腿了。我们恨透空压八一五，但拿他又没法，一来我们没有重武器，二来他们躲在墙后面看不到，要打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在8月初八一兵团多路人马攻打建设、空压厂时，建设厂的军工兵团及聚集在建设厂的反到底派进行了反击，一举将建设厂八一兵团、二十中、三十五中、机校（重庆机械制造学校）、卫校（重庆卫生学校）的八一五派从谢家湾地区赶出，占领了谢家湾的制高点清水池，威胁到石（桥铺）杨（家坪）公路边的八一五重要据点重庆工业学院。清水池在建设厂谢家湾两（路口）杨（家坪）公路旁建设厂职工宿舍北边的一道几十米高的山梁上，担负着供建设厂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功能。在清水池，向南可俯视整个建设厂厂区，向北亦可直射西北面不远凹地处的重庆工业学院。八一五丢失清水池后，就集结兵力企图夺回这个制高点并一举拿下建设厂。8月4日晚，八一五动用了坦克，向清水池区域发起了攻击，占领了清水池周边的阵地。8月5日天刚亮，由南岸区十一中、十七中、南山中学

等校中学生组成的九一纵队红二连就被派往清水池守卫。上午八一五向清水池发起了总攻，双方都进入殊死搏斗，危急时几乎是隔着池子石坎对射。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动用了九一纵队独立排，由排长简光辉率领一个班的战士，与建设军工井冈山战士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将一辆四联 14.5 高射机枪硬由清水池南山坡菜地连推带拉运上了清水池。四联 14.5 高射机枪是安装在四轮车底盘上可牵引移动的防低空飞机武器，以口字型排列的四根枪管除能在车底盘上作 360 度旋转外，还能作上下移动，枪管放平后也能像机枪一样平射，使用的弹丸直径为 14.5mm，故称为四联 14.5 高射机枪，有效射程在 3000 米以上，它是枪族中的重型武器。

反到底将四联高射机枪投入清水池保卫战后，霎时如若蝗虫般密集的弹丸飞向周边的八一五阵地和不远处的八一五据点重庆工业学院，在重武器的强力打击下，八一五全线败退。这里的“枪林弹雨”决不是文学修辞。停战后我曾回视清水池，北边池坎处有好几具尸体未能掩埋，头部被打烂，腐烂的尸体上满是红头绿身大苍蝇，显然这是八一五进攻清水池留下的尸体。作为水池围栏立柱的钢管，直径大约在 6 公分左右，高 2 米多，根根钢管上都布满数十个弹孔。

清水池争夺战休战后，在警司的督促下双方达成停止武斗协议，定于 6 日中午 12 时停火。但是武斗的后面各有各的后台：八一五有警司，反到底有省革筹，谁都是在保卫党中央，谁都是在保卫毛主席，谁打赢了谁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因此谁也不会停火，停火只是暂时的休整。

清水池一仗八一五的败退，使反到底派的作战前线推进到石坪桥一带。8 月 15 日下午，九一纵队独立排接到作战指挥部命令，到石坪桥预制厂山梁驻防。预制厂山梁的下面是石（桥铺）杨（家坪）公路，公路边是重庆建筑公司大楼，八一兵团石坪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栋楼里。16 日凌晨 3 时许，枪声在石坪桥响起，我校杜德裕（高 67 级团支部书记）把 12.7 高机推上战壕，刚一露头，对方的一颗子弹就击中他的额头正中，当场就阵亡。下午杜德裕尸体运回疗养院，17 日下午，独立排举行了追悼会，沉痛地将他安葬在驻地战壕处的菜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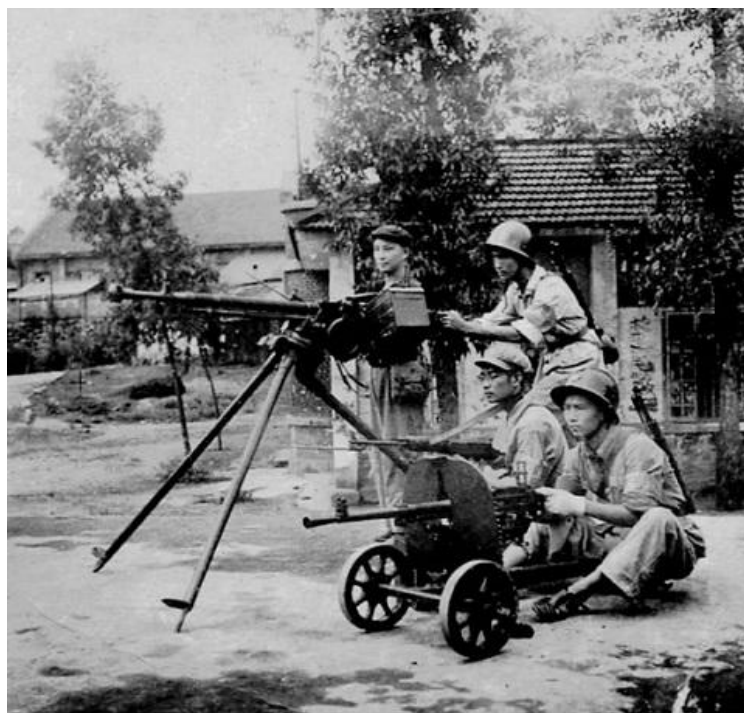
### **我们独立排在潘家坪伤亡近半**

杜德裕的阵亡而引发的复仇烈火使每个人忘记了害怕。18 日晚，军工作战指挥部派联络员来说，我们有两个指战员在潘家坪被八一五抓去了，要独立排立即去参与营救行动。

为打通重庆大学到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即“市革筹”，设原重庆市委大院内）的通道，在“七·二五”重庆工业校一战，八一五就打掉了化龙桥地

区的“拦路虎”工业校反到底，但上清寺工业展览馆等咽喉地带却被反到底牢固占领，成为八一五派从沙坪坝经上清寺到市革筹的障碍。虽然在7月7日的武斗后，反到底二轻兵团已经撤离嘉陵江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八一五派控制了嘉陵江南桥头咽喉，但若发生枪战，北桥头不远处的长安厂反到底派却可用“三七炮”（弹丸直径37mm炮）轻易封锁大桥，这条路也不安全。8月初八一兵团打下了空压厂，这样杨家坪、石桥铺这一线被八一五控制，只要打通重庆石油学校路口到袁家岗这一小段路，那么重大八一五经石桥铺、两路口到市革筹的路就通了。要打通这条通道，八一五必须拔掉潘家坪那一带的重庆河运校、重庆邮电器材厂（515厂）、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三个反到底据点。

8月18日白天的战斗我们并不清楚，傍晚接到的命令也只是去救人。独立排由建设厂疗养院进入建设厂内的枪修车间，李林师傅对12.7高机进行了检查，因为这挺高机是重庆工业学院教学用报废枪，故障多，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我们就出厂前往潘家坪。夏夜的谢家湾一带非常寂静，除了高机轮子在公路上滚动发出的声响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公路两旁建设厂



左起 石孝殊(老师)何清福 何钊祥 吴纪白 合影于建设机床厂 1967.8

职工住宅也没有一丝灯光，借着夏夜星空微光，我们经重医门诊部与重庆医学院之间的公路，于深夜十一二点钟才到达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我们分开住在一栋楼的二楼房间，房间里很乱，像被抢窃过一样，床上不安全，我们都睡在地板上。19日上午，枪声越来越密集，我们也分成几个战斗组投入战斗。据现场指挥讲，八一五就在对面那栋大楼里，从我们这栋楼到对面那栋楼由一条弯曲的小道连接，中间是一片矮树和竹林，因为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是文革前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为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修建的行宫，故整个潘家坪几乎被园林化，在园林里作战视线不是很好。杜德裕阵亡后，梁春生接替为高机射手，我和张世元协助他为副手。我们把高机在小路旁合适位置架好，刚射击了几发弹枪就卡壳了。枪声暴露了我们的位置，梁春生还没来得及从高机座位上下来，对面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



小腿，我们急忙将他拖离险地。现场指挥叫我们快把高机拖下来，拖回厂里去修理。

高机很重，我和张世元拖着高机从潘家坪又步行回到建设厂枪修车间，李林师傅立即就动手修理。高机修好后，我们于下午又将高机拖回潘家坪，此时独立排已奉命退出战斗，但有关独立排的噩耗令人震惊：我们走后战斗进入白热化，继梁春生受伤后，彭家荣、简光辉、麦志荣、吴文忠等先后受伤，龙腾祥、赖思放、李金生确认阵亡，由于枪弹密集，尸首无法抢下来，何树清腿受伤后也无法将他救下来，出去十几个人，死伤几乎占了一半，到晚上独立排剩余的战士才回到黄葛树驻地。

20日上午，我们到重医去看望受伤的战友，简光辉右手掌被击穿，彭家荣右手食指被打掉，麦志荣腹部中弹，吴文忠被手榴弹炸伤。离开重医后，我和何钊祥三人就去了潘家坪，他们知道阵亡战友的位置。十点钟左右终于冒着危险将龙腾祥、赖思放的遗体抢了下来，李金生遗体不知在哪里，也没看到何树清，可能被八一五救走了。

处理完龙腾祥、赖思放遗体，我便先赶回驻地，在烈日高照的医学院与医学院门诊部之间的公路上，一架板车运载着阵亡战友的棺木，棺木缝隙还淌着血水。路边一中年男子背着绿挎包，腰间挂着两颗三七炮弹头改成的手榴弹，见棺木状忙用手绢捂住口鼻。我那时的火气不知为何这么大，把挎着的枪一下转到手上，“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那人一见，忙将捂鼻的手放下道歉不迭。下午，去医院的战友都回来了。傍晚，在山头杜德裕坟旁，我们沉痛地安葬了龙腾祥、李金生。21日中午，伴随凄厉的汽车声，麦志荣的遗体又运回到驻地，四位战友并排安息在山头上。

此时“五七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简光辉、彭家荣都受伤住院，独立排的担子就落在了吴纪白、徐德明和我肩上。

## 停战交枪与返校的曲折

8月18日八一五挑起的潘家坪一带的作战，八一五没捡到什么便宜，反而使自己损失惨重，不得不从战略上的进攻转为战略上的防守，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进攻了。反到底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解除了八一五对建设厂的威胁，使建设厂地区得到巩固。

1967年长江的洪水比1966年还大，建设厂、空压厂面临长江边的大石盘被洪水淹没了，已是农历7月中旬尾，还没有退水的迹象。洪水在九龙坡下的江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原来只能沿长江北岸航行的轮船，现在可以靠南岸一些了，

这样空压厂的“天鹅宝蛋”在船上就可清晰看到。8月8日望江厂“舰队”到建设厂后一直没离开，8月22日傍晚，“舰队”的登陆艇离开码头，停泊在靠南岸能直接看到“天鹅宝蛋”的水面上。天刚擦黑，登陆艇上的“三七炮”向“天鹅宝蛋”发起炮击，因为三七炮一个弹夹有5发炮弹连发，故我们在黄葛树山头能清楚地看到一串串火球飞向“天鹅宝蛋”，碰上围墙就炸裂，溅起一团团火花，随后传来“嘣……嘣”的爆炸声。想着前段时间空压厂八一兵团在上边居高临下对我们的威胁与伤害，真是解气。炮击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空压八一兵团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8月23日，建设厂反到底派动用“三七炮”、“四联高机”等重武器向空压厂及杨家坪地区的八一五发起全面反攻，拿下了空压厂，杨家坪又成了反到底的天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四处可听见。这时中央调查团和省、市革筹首长来到了建设地区，说中央有三点指示，不准再打空压厂。我们感到不理解：为什么八一五打长江厂、长安厂，出动坦克打嘉陵厂等地时，中央没有指示，唯独反到底一打空压厂就有指示？

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文革对重庆空压厂武斗问题的“八二三”指示，是周总理22日深夜指示中央文革发给重庆的特急电报，电文为：

1. 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
2. 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 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三条指示中“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明显不过地是指反到底。问题是，8月22日晚反到底“舰队”向空压厂发起炮击，深夜在北京的总理就知道了并发出指示，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八一五派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办不到，唯有警司！这样的偏向，不但八一五心知肚明，重庆四百万人都明白。因为我们是8月25日才知道急电全文的，所以我们起初认为是中央“八·二五”指示，后来才知道是“八·二三”指示。

鲜血和生命的教训，军队的偏向，中央文革指示的随时的不确定性，使两派都学会了“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拿现在时髦的话“说白了”，就是对执行中央的指示已学会打折扣。反到底派对“八·二三”指示不予理会，8月23日照打空压不误，收复了杨家坪地区，使长江电工厂成了一个孤岛。

在潘家坪战斗中，12.7高机基本没起作用，反倒使射手暴露受伤。建设厂修理工李林提出这挺高机已无法再修了，故作战指挥部同意给我们一挺新的，就是大家所知的坦克炮塔上的那种高射机枪，到刚打下来的空压厂仓库去提。由于原射手梁春生受伤住院，故我接替了他的位置。拿到领枪命令后，我与张世元很

快就去空压厂提枪。

战后的杨家坪一片狼藉，就像我们在战争影片里看到的场面：两（路口）杨（家坪）公路旁遍体弹洞的杨家坪百货商店大门大开，里面的物品已被转移或洗劫一空，杨家坪转盘处的建设电影院在战火中已成一栋废墟。听说在石（坪桥）杨（家坪）路上有一辆坦克被反到底用高压电电坏，我们去转了一圈，但没看到，只是柏油路面满是坦克履带压出的深深印痕。在杨家坪转盘附近转了一圈后，我们就到空压厂仓库提高机。回到驻地，我们打开还未开箱的军绿色木箱取出高机，用柴油将涂满防锈油的高机清洗干净后，在山头上对着长江南岸的四十三中学旁刘家花园内高高的炮楼射出 100 发枪弹，一来检验枪，二来也解解气。

自中央“八·二三”指示下达后，加上中央调查组已经在重庆各地视察，重庆枪战逐渐平息，虽说枪还在各派手里，但已很少听见枪声了。在中央的督促下，9月1日两派头头在警司达成无条件全面停火协议，时间为9月2日18时正。9月5日中央《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式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时称“九五命令”，5日当天我们就传达了。

根据两派达成的停火协议和中央“九五命令”，大坪、杨家坪地区受命于9月11日交枪。11日下午，我们带上枪支弹药，乘车到重庆警司交枪，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驻地。

看来停战已实现。9月20日，学校薛贵儒书记、孙学才老师到建设厂来接我们回校。几个月不见，大家见面后都非常亲热激动。19日我们已将李金生的遗骨找到并运回黄葛树驻地，在孙老师（生物老师）的帮助下，在棺木里将遗骨按人体状摆放后，又葬入山头阵地，一排五个坟头，面朝着滚滚长江对面的家乡。独立排就要离去了，望着这一排坟头，心中只是失落。

大石盘亦叫九龙滩，九龙滩的北岸是九龙坡，九龙滩的南岸叫九龙寺，这一小段长江水面在枯水时节波涛翻滚有声，称龙凤溪。重庆掌故中称龙凤溪水下有莲花（芙蕖），每当夜深人静，会伸出水面，传说若将亡者葬入莲花，必福佑后人，是为风水宝地。我希望山岩上的五个坟头融入龙凤溪风水宝地，百年不孤独。

彭家荣的伤基本治愈后回到驻地，简光辉的手还没治好，前几天转到成都去了。经过讨论，决定我们先到黄山与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会合，然后一道回铜元局。21日下午5点钟左右，薛书记、孙老师与我们一道，在7792部队一班军人的护送下，由储奇门过江准备到黄山，控制着车渡的八一五知道我们是反到底时拒绝开渡，我们只好又返回建设厂。22日上午又由7792部队护送到储奇门车渡，被警司检查站拦到下午一、二点钟。因怕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又返回建设厂。

经商议，决定不再在储奇门过江了，改为从李家沱。7792部队的军人一直把我们送到重庆交通学院，在交院吃过午饭，交院用车把我们送到了重庆邮电学

院，但去后才知军工长江兵团已回铜元局了，我们只好在邮院住了一晚上。9月24日早上，我们终于回到了铜元局。

## 拒绝参加“12月决战”

1967年9月底，一个全国性的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高潮掀起。9月27日，由南岸广东山驻军（广东山为长江厂地区的一座高山头，从民国至今的数十年间一直有军队驻防）、长江电工厂军管会（原驻厂军代室）召集四十三中两派，由“五七部队”吴纪白、孙学才，“11·27”唐永健、罗绍河签字达成协议：“政治上一视同仁，经济上、生活上一视同仁”，解决了“五七部队”老师的工资和困难同学的助学金问题。自长江厂“七二〇”事件反到底派被赶出铜元局地区后，我校“五七部队”的成员大都处于“休眠”状态，现在中央号召实现“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早点结束文革这是大家都渴望的，希望早点复课读书或毕业分配工作。

为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10月27、28两天“五七部队”与“11·27”在学校“教工之家”进行了首次协商，在重庆两派严重对立的大环境影响下，是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谈就能解决问题的，双方存在的分歧在于：

### 一、成立“大联合筹备小组”

“五七部队”提出，先成立“大联合筹备小组”来促进两派大联合，再结合原学校党支部书记薛贵儒，使“大联合筹备小组”成为学校临时权力机构来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它有利于两派大联合，有利于学校的“三结合”的建立，有利于斗批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但这个合理的建议，却被重大八一五头头周家瑜9月26日的讲话破坏了，他这个讲话说：“在我们八一五掌权的地方，不能同‘砸派’联合，不能‘平分秋色’、‘和平让权’。在我们没掌权的地方，要从‘砸派’手里夺权。”于是我校“11·27”中部分人就跟着嚷嚷：“我们就是不能同你们‘平分秋色’，要想联合掌权，哼！就是不行！”

“五七部队”指出，现在中发（67）367号文件下达了，文件指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采取这样的政策将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使还没有建立革命领导班子的地方，能更迅速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使那些已经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的地方的革命政权更巩固”。希望“11·27”能按中央指示办事，而不是按“周三高”（当时给周家瑜起的外号）的胡言乱语办事。

### 二、学校“三结合”问题

原学校党支部书记薛贵儒，早在1967年2、3月份就是全校师生公认的“三结合”对象，但由于重庆革联会问题使学校造反派发生分裂，使“三结合”工作停顿。在会谈中涉及薛贵儒结合问题，“11·27”的代表说：“谁叫他不参加‘险峰’（“险峰”属八一五派教工组织），是的话早就结合了。”事实是薛贵儒哪派组织都没参加，只是偏向于“砸派”（反到底派）观点。



五七部队勤务员与老师的合影

根据9月27日两派达成的基本协议，

11月中旬“五七部队”200余名成员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回到了学校。但如何复课闹革命，谁来领导复课闹革命的问题还未解决。不过回校复课闹革命是大方向，只要能在政治上、老师生活上一碗水端平，其它的事可慢慢解决。因八一五派已经公开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我们在学校第二球场举行了集会，学习了《四川日报》11月11日的社论（这个社论被八一五派批判为“大毒草”），要大家建立起一个信心，省革筹张、梁、刘、张四位首长是中央派来的，是谁也打不倒的，违背历史潮流的人，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不知是谁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由战争得到。从10月底以来，山城到处流传着八一五和反到底12月要大决战的说法。11月初，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重庆三次接见反到底派负责人，严厉斥责，进行公开打压，同时在接见八一五派时甚至对他们说：我已经警告反到底派，如果他们再打，就会“完蛋就完蛋”了。如此露骨的支一派压一派，使重庆的武斗又重新出现，八一五派开始在“九五命令”后两派上缴武器的各地封存点抢夺武器，而反到底不可能到警司去抢夺武器，反到底的处境十分恶劣，也不可能与八一五大决战，只得结伙外逃。

11月中旬，山城到处贴满“八一五派努力干，打倒刘张过元旦！”的标语，弄得人心惶惶。大决战就是大屠杀，刚过去的那场血与火的战争，死难者的血迹还未干，尸骨还未寒。我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牺牲的战友只有原谅我们了，我们不能替你们报仇，这个仇到底向谁报，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

到底是谁？我们要的是文化革命，反对一切武化革命。我们已认清了武斗的真实面目。对于武斗，我们的方针就是‘逃命、避难’！”

不久我收到哥哥的回信，他在回信中说：“一分为二的来看问题，双方都有正确的，但双方都有错误。当然错误的程度有所不同，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发生了武斗是很令人痛心的，希你千万注意，你谈到不想参加武斗，这很好。但由于客观事实的存在，很多迹象表明，是有‘升级’的可能，怎么解决，首先希你千万不要参与……”

“复课闹革命”，我想提出口号的那些人也只是坐在办公室想当然而已，未必就有神丹妙药。我们这次回学校也只是做一个姿态而已，绘声绘色的 12 月决战只有傻子才会在重庆等死。因此“五七部队”这次聚集后，就宣布大家暂时分散各自避难，千万不要去参加武斗。这样，简光辉还在成都医治手伤，彭家荣到广元 8342 部队他哥哥处，吴纪白回湖南老家，何钊祥到綦江松藻煤矿么爸处，我随哥哥去哈尔滨。

---

【生逢乱世】

## 两位母亲搭救“俘虏”

管小俊

1968 年夏天，我家小院邻居家悄悄来了一不速之客。原来是这家儿子的同学，带来一惊天消息：这家的儿子，我的邻居小哥哥，参加武斗，被对方俘虏去了。报信的同学没有敢休息，又接着到其他同学家报信去了。

那同学走后，这家人如天塌一般，六神无主的女主人赶快找同楼层邻居帮忙拿主意。邻居说，你儿子是反到底派的，俘虏他的自然是八一五派的，而我是反到底派的，无法帮这个忙，楼上苏阿姨（即我妈妈）是八一五的，你看她能帮忙否？

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应该是 1967 年）。但是我绝不相信我妈有本事把你死我活现场上的俘虏捞出来。不过邻居找到我妈时，我妈却满口答应，明天就去救人（当时已经黄昏了）。

第二天，直到黄昏，两个母亲才疲惫不堪地回来了。人救回来了吗？没有！原来这一整天她们都在城里奔走。

第一站到的是我妈的公司。公司八一五倒是开了介绍信，但也有保留地认为战场凭流血死人抓到手的俘虏，光一纸介绍信怕放不了人哟！于是提了两个建议：



1. 到我妈公司的上级单位——市商业局——去再开一个介绍信，权威性总要强一点；2. 对我妈而言，救的是邻居的儿子；最好让我们邻居单位也开一个，毕竟是救自己的儿子。于是第二站就到了邻居的单位。

邻居阿姨是我家附近一个单位的领导，当时已成了一个靠边站的走资派。好在她们单位的八一五还没有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也给她出了介绍信。第三站，市商业局八一五也开了介绍信。

一切都看第三天的努力了。

第三天一早，两位母亲带上了水壶、毛巾，向着那传说中的大坪、杨家坪、沙坪坝武斗核心区进发。此行她们没有明确目的地，我不知道她们怎样去大海捞针。由于武斗，交通中断，她们只得全程走路。我不知道她们历经了多少苦难，只知道当时的人心向好。尽管她们去打听时遇到的人都认为，两个母亲是不可能救出一个在武斗战场上的俘虏的，但是都还是热心地提供线索，指路，甚至帮忙带路。就这样，两个母亲在大半天时间内就硬是从大海里捞到了针——找到了邻居小哥哥的关押地。接着又在关押地和领导办公地之间跑了N个来回，终于拿到了战俘释放的领导签字。

后来我推测（虽然没有这样的记忆），我妈妈应该是她们单位八一五的一个小头目。不然她怎么能轻松拿到她们单位、邻居阿姨单位和市商业局八一五的介绍信，又怎么能拿到关押单位的释放签字呢？

拿到尚方宝剑，又到关押单位签字画押后，看押人员立即通知邻居小哥哥：带好行李，准备走人，你妈妈接你来了。

事后我听小哥哥聊天说，他们抓进去后就面临着死亡的恐惧，不知能否活出来。他们每天都要干苦力，任务就是挖坑埋死尸。重庆的三伏天，死尸都发臭了，听说要是尸水溅到身上，皮肉都会溃烂，永远医不好……听说妈妈接他来了，他都不敢相信！和他一起被俘的四五个同学，都来恭喜他，向他道别，让他回去后给自己家带话，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他离开。

三个人向看守人员道别，颤颤巍巍向门外走去。正在要迈出鬼门关时，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的命令：你们三个等一下！

这一声低喝，犹如晴天霹雳，让三个正要走出鬼门关的人惊呆了。

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站下来，面对现实。三个人转过身来，原来是看守中的负责人拿着他们签了释放批示的证明在看着什么，接着又招呼他们倒回去。

这时三个人的心都紧了。

回去后，看守负责人就开始询问我的邻居小哥哥：姓名？好久进来的？一同进来了几个人？你们是否都是同学？

在得到肯定回复后，负责人转向了两位母亲，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可不可以把他们几个都带回去？

一听这话，我妈理解到，看守负责人是要借他们领导批示中的含糊之处，把几个学生都放了。但是，也要两位母亲分担一下责任。

我妈看了看邻居小哥——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妈，巴不得能把他的同学都一起救出去。

我妈本来就侠肝义胆，若是怕事，就不会同意来救人了。所以她与邻居阿姨交换了一下眼神，便再次签字画押，搭救全部“俘虏”。

其他同学得知自己也可以自由了，有怎样的惊喜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邻居小哥与他的同学小别重逢互表喜悦之情的时候，看守负责人打断了他们，开始训话了。

训话内容大概是：我们八一五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不说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了），不关押你们了，把你们交给兄弟八一五单位继续教育。你们回去后要听话，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绝不能再参加武斗了。学生们赶快知趣地保证再不参加武斗了。

然后那负责人就介绍了战场态势，推荐了一条最安全的道路回城，说路上到哪里是八一五地界，遇事由两个母亲去协调；哪里是反到底地界，遇事由学生们保证两个母亲的安全。这时学生们都由衷地表示了谢意。最后那负责人还特地招呼说，目前是非常时期，出门就引人注目，所以要低调些，走得分散一点，注意安全，不要惹事。祝大家顺利到家！

然后一众人等就离开了那个不太像鬼门关的鬼门关了。

余下的十多公里路程就不是事了。大家劫后余生似的，迈着轻松的步伐，众星捧月地把两位母亲带回了城里，各自回家。

---

【生逢乱世】

## 艰难与恶心的返乡路途

章孟杰

1968年7月，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那时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尽管表面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各派头头也大多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当上了“委员”、“常委”之类，但各派群众组织还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双方都手持武器虎视眈眈，恨不得把对方干掉，不时还爆发局部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到处人心惶惶。重庆是“八一五”派的大本营，得到解放军第五十四军的支持，成都是“八二六”和“反

到底”派的大本营，得到解放军第五十军的支持，两派因此相持不下。

那时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也趁机造反，将社办林场砸烂，回城闹革命。我和同一林场的知青春节前就爬车回到重庆，一呆就是近半年。那时粮、肉、油、盐、菜、肥皂什么的都要票证，我们把带回来的粮票吃光了就在城里站不住脚了，想着还是回农村去，好歹能领到粮票，有口饭吃。

我二哥下乡在川北的达县专区通江县，我下乡在达县专区巴中县（现在改名巴中市）。以前我们回家来往可以走达县或南充这两条路线，有长途客车通行。但春节后两派又干起来，当地“反到底”派在主场站不住脚，就撤往附近专县，大概想重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南充和达县这两条交通干线就被切断，甚至传闻公路上埋设了地雷，没有什么车敢冒死上路。

我二哥他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可以绕道成都、广元到巴中和通江，只是路程比原来走达县或南充远了近三倍。二哥决定和他的伙伴先去探路，如果顺利回去了就把路线告诉我，我再和同伴启程。母亲也赞同，她担心两个儿子一道走，兵荒马乱的，万一遇到不测就全完蛋。

十多天后，二哥来信，他们已平安回到通江，信中还介绍了若干注意事项。我接信后大受鼓舞，于是立马与同林场的知青胡克环、杜宗先、何莉、杨晓琼他们商量回巴中。那时重庆与成都的公路断绝，只有铁路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还在通行，但完全不能正常营运。

8月的一天，我们吃过晚饭后，在亲人的再三叮嘱下前往菜园坝火车站集中，因为成渝线的客车是晚上发车。菜园坝等待上火车的人很多，人声嘈杂，乱哄哄的一大片，大多是要到成都去。我们去售票窗口每人买了一张到大渡口的两毛钱车票，这是二哥教我们的，先混上车再说，路上没人查票的，到了成都再想法混出车站。

这是一列慢车，本该晚上八点多钟开车，可我们上车后等到了时间，火车却毫无动静，像一条僵死的巨蟒停在铁轨上。问同车的人，没人知道车啥时开。

8月的山城，白天骄阳似火，到了晚上又闷热如蒸笼，在车厢里呆了一会儿，全身就被汗水湿透。没办法，很多人熬不住就又下车，我们只好跟着下去。问车站的人火车啥时开，他们谁也没个准确答复，只叫等着。我们又不敢离开，只好在旁边找个地方坐下等。

大约到了十点多钟，不远处人群喧哗起来，只见一群造反派推搡着两个女孩朝我们这边走来，有人嚷着说抓到了两个成都“八二六”的探子。原来这两个女孩在等车摆谈时露出了她们的成都口音，于是就有“八一五”派的人说她俩是成都“八二六”的探子，把她俩抓起来。那俩女孩十七八岁模样，面容俊俏，穿着裙子，显然是中学生。她俩竭力分辩说不是“八二六”派的探子，是到重庆来探

亲的。那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根本不听她们的分辩，强拉扯着她们上了一节车厢，接着又把车厢里的其他人赶下来。有人小声说：“这两个成都妹儿要倒霉了！”

果然，一会儿车厢里就传来女孩的尖叫声：“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救命呀！救命呀！”我们赶快从打开的车窗望去，只见那几个家伙正七手八脚地在脱俩女孩的衣服和裙子。人群中有人愤激地说：“太不像话了！”还有人说：“赶快去叫警察！”有人马上回答：“这时哪里还有警察！公检法都瘫痪了！”有几个人想进车厢去制止，门口有人守着，挥舞着手枪威胁道：“谁敢上来？当心老子枪子不认人！”大家知道他们啥事都做得出来，只得止步。车厢里，那两个女孩已被脱光衣裙按在座位上，先还看见她们白生的大腿在座位上方挣扎晃动，马上就被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大汉抓住，不一会儿就听见她们的惨叫声，她们只能像待宰的羊羔一样任由这群暴徒蹂躏。

终于有人在候车厅找到两名执勤的解放军战士跑步赶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俩叙述车厢内正在发生的事，他俩立即想上车，但被暴徒堵在门口，有暴徒威胁说：“当兵的少管闲事，当心连你们一起打！”两个战士势单力薄，束手无策，只好警告说：“你们这是犯罪，赶快把女孩放了！”那伙歹徒嘻皮笑脸地说：“等弟兄们玩够了自然会放她们。”

过了好一会儿，两个女孩终于出现在车厢门口。她俩赤身裸体，脸色惊恐，大腿上满是鲜红的血和白色的精液，像狂风中的树叶浑身发抖，哆嗦着走下车厢，里面的人随即将她们的衣裙扔出车窗。两个执勤的战士赶快捡起衣裙递给女孩，围观的几个中年妇女立即上前帮助她俩把衣裙穿上。战士愤怒地对车厢里的暴徒说：“这笔账总要和你们清算的！”为首的暴徒轻蔑地回答：“老子们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死了那么多弟兄，玩几个姑娘算什么！”

战士不再搭理他们，扶着两个女孩走了（此后不久，在一次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中央领导在讲话中列举造反派的种种劣行时特别提到他们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强奸妇女的暴行，要求缉拿罪犯）。以前就听说武斗时，有被俘的女学生遭到强奸的事，这次算是亲眼目睹了。

世道如此，凶险难测，我不禁为我们这次返乡行动担忧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人群骚动起来，大家纷纷往车厢里涌去，我们不明就里也跟着往车门里挤。每个车门口都有几十个人在争抢着要上，想挤上车谈何容易。看见很多人在爬车窗，我们赶快也去爬。杜宗先身体灵活先纵身跃起抓住车窗下沿，我们在下面拼命推他，把他塞进车内，然后他在上面接应，拉的拉，推的推，我们几个终于都上了车。车下的人还在不断从车门和窗口涌入，不一会儿车厢就被挤得水泄不通，连行李架、座位下和厕所里都挤满人。车厢里实在装不下了，其他的人就往车厢顶上爬，最后连每节车厢顶上都坐满了人，那情景真像战争年

代老百姓逃难一般。

车厢里又闷又热，人人汗流浃背，拥挤得根本无法转身。我身后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青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两个乳峰抵在我后背上，她呼出的气直冲我的脖子。大家都在祈祷：“快开车吧！快开车吧！再不开车人要被挤死了！”

终于蒸汽机车发出一阵沉重的喘息声，缓缓启动了，车厢内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有人看表，时间已快凌晨，睡觉是不可能了，只能站着眯一会儿。

这车是慢车，沿途每个站都要停，因为严重超载，所以车速很慢。经过一夜折腾，每个人都是又饥又渴，但即使火车到站也没人敢下车，因为下去以后很可能就无法再上车了。车上的人仿佛达成默契：下车可以，要上车就不行。

好在车停站后就有农民提着篮子来售卖吃的，车内的人就拼命把手伸出窗外，只要是吃的就买。因为渴得厉害，西红柿最受欢迎，很快就被买光。但吃了西红柿问题又来了：人要小便。好在火车经过江津、永川、隆昌几个大站后终于下了一些人，车厢略微松动了一点，人可以打转身了。我内急憋不住，但根本无法上厕所，况且厕所里有人也不会开门，就朝旁边挤了挤，对着车厢壁就扫射起来。这正应了那句俗话：“屙尿不看人，看人屙不成。”

不一会儿，我背后那个女青年也憋不住了，她红着脸小声说：“大哥，让一让，我要上厕所。”我回答她：“上厕所根本不可能，你挤不过去，即使挤过去了里边也有人。”她为难地说：“那怎么办？成都还远，憋不到那么久啊。”我扭头看了看，杨晓琼和何莉显然听见了我们的说话，她俩也说想解手，已经憋了很久了。我回答她们只能就地解决。几个女孩无奈中只好挤在一起，把要解手的人围在中间，解手的人蹲下去……其他的人也照此办理。一会儿车厢里就弥漫着难闻的尿臊气。

车过内江不久，忽然间一个人影从车窗晃过，靠窗的几人同时惊呼：“车顶有人掉下去了！”我赶快挤到车窗探头去看，只见一个人正顺着路基向下翻滚，最后一动不动了。大家面面相觑，说这人肯定没命了。那年月，人命贱如蝼蚁，死在荒郊野外，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可怜他的父母！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煎熬，列车终于在第三天黎明时抵达成都。走出拥挤不堪的车厢，顿时觉得外面的空气太清新了！大家赶紧活动一下几近麻木的腿脚后，就随着人流准备出站。

只见一百多个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早已成散兵线守候在出站口进行验票，我们顿时紧张了。前面有混票的被查出与当兵的拉扯起来，后面有人大喊：“冲啊！”于是几千人一齐朝前涌。当兵的手挽手试图阻拦，但几个回合后终于支持不住，被冲开一个缺口，人流“哗”地向站外涌去，当兵的只能在旁边抓到几个算几个。我们好在没带行李，每人只是一个挎包，所以跑得快，一个都没被抓住。

走出车站，先找到自来水龙头，每人都狂灌一气，实在太渴了。然后每人买两个馒头填饱肚子后，就按照二哥信中的指点去四川省革委会群众接待站开路条。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解放军军官，他听说我们来自重庆，顿时警觉起来，疑心我们是重庆“八一五”派的，就拐弯抹角地用话套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拿出当初回重庆时在公社开的证明，并恳切地说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因为达县和南充道路不通才绕道成都、广元。那军官看了证明，又听了我们的解释，终于相信我们是知青，就板着脸教育我们“回去后不要再乱跑，安心和贫下中农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革命道理，最后给我们开了证明，要求沿途各级革委会不得阻拦、要为我们提供方便。

我们拿到证明如获至宝，立马又去火车站买了到广元的车票，也是买两角钱车票混上车再说。成都的秩序显然比重庆好得多，火车准时发车，车内不拥挤，我们总算坐上了座位。途中列车员查票，我们拿出省革委会接待站开的证明给他看，顺利过关。

第二天到了广元，这里是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故乡，我们趁机游玩了一番，然后凭着证明又搭支线火车去一个记得叫白沙的地方。到了那里天色已晚，我们草草吃了晚饭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客栈住下，把这几天流的臭汗洗干净，把衣服也换下洗了。

半夜，隔壁的喧闹声把我们惊醒，竖起耳朵听，原来是当地的造反派抓住一个对立派的人正在审问：“老实交代，他们派你来刺探什么？”

“没有人派我来，我是回来看我老婆娃儿的。”

“啪！”听到鞭子抽打在肉上的声音，那人哀嚎一声，继续申辩：“真的没人派我回来，我老婆托人带信说我娃儿病了，我偷跑回来看娃儿，我不骗你们！”

“啪”又是一鞭：“你还不说实话？信不信让你坐老虎凳！”

听到这里我们差点笑出声来：这些人咋学得跟白公馆渣滓洞的特务一样？被审问的人“呜呜”哭起来，审问的人不耐烦地大声吼道：“不说实话，拉出去毙了！”被审问的人连声哀求：“你们不能杀我，我还有老婆娃儿啊……”

那伙人拖着他出去了。我们屏住呼吸恐怖地等待着行刑的枪声响起。但四周恢复平静，没有响枪，大概是吓唬他的，我们松了一口气。至于为什么没来清查我们，我们猜测还是省革委会接待站开的那张证明起了作用。

天亮后，我们简单吃了早饭就四下打听哪里有去巴中的货车。这里是广元市的一个货物中转站，巴中县有个省运 47 队常有车来此将化肥、食盐、日用百货等运往通江、南江、巴中、万源等县份，这都是二哥在信中告诉我的。转悠了一上午，终于在一个货场找到了车门标有“省运 47 队”的解放牌车队，正在装载



化肥。我们赶紧就在附近吃了午饭，然后守候在一旁。

不久司机来了，我们围上去，递上香烟，恳求司机让我们搭车回巴中。谁知那司机以货车已超载为由一口回绝。我们再三恳求，那司机最后仅同意让两个女孩上车。我们没办法只好帮助杨晓琼和何莉上了车，然后站在一旁。司机进驾驶室刚一发动汽车，我一个助跑飞身爬上货车，胡克环和杜宗先见状也赶快来爬车。司机从后视镜中看见了，打开车门气势汹汹地向车后走来把他俩拉下去，吼道：“谁同意你们搭车了？你们以为是知青就可以无法无天？”我赶紧伏下身子躲在挡板下，司机向车厢里看了看没发现我，就气冲冲地又去开车了。车子一起步，我赶紧向他俩招手，他俩飞奔向前跃起抓住挡板，我们车上三人拼命把他俩往车内拖，终于拖上来，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半路上司机停车加水，看见我们三个男知青都在车上，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还是上来了？”我们连忙说好话：“司机叔叔，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知青吧！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两个女知青说着都哭起来。那司机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缓了口气说：“那你们就在车上好好呆着，再不许别人上来，尤其不许农民上来偷化肥。”我们连忙答应帮他看好化肥。

天色晚了，车队开到一个路边小镇准备过夜，这里离巴中还有近百公里。司机和搭车的几十个人拥进小镇唯一的饭店吃饭，一个二十来岁漂亮的女服务员笑吟吟地出来接待大家。她见来了这么多人，为难地说：“店里的饭菜都卖完了，只有重新给你们做。”有人说：“重新做得要多少时间？做好恐怕鸡公都叫了。”有人又问：“有面条吗？”“面条也卖完了。”她回答。我见屋角有一台半机械的做挂面的机器，这东西我们林场也有，我和胡克环都会做，就问：“有面粉没有？”她说面粉有。我就说：“你把面粉拿来我们马上做面条。”她半信半疑问：“你会做？”我回答她：“你放心好了。”她马上撮来面粉，我和胡克环就干了起来，那美女服务员连忙招呼大家进店坐，烧水泡茶，然后拿出碗筷一一打上佐料。

只用了十几分钟，我俩就将面条压制出来，众人纷纷夸奖：“这两个知青还能干呢。”我笑着对搭我们的司机说：“你看，你如果今天不搭我们连晚饭都不得吃。”那司机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只是你们知青造反把人搞怕了，看来知青并不都是坏人。”

那美女把水烧开了就赶紧下面，一人一碗。端给我俩的时候，她小声说：“今天辛苦两位兄弟了，你们的两碗面就算我奖励的，不收钱粮。”我们连声道谢。吃完面我们去找客栈住宿，谁知早就客满。我们几人合计：反正天热，我们就在车上过夜，也节省几毛住宿费。

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把清辉洒满大地，四周一片寂静。我们回到车上，把化肥袋子尽量摆平，用挎包当枕头，也顾不上灰尘就躺下。这时有人来到车后，

诧异地问：“你们怎么没去住客店？”我坐起来一看：是司机，他身后站着那个美女服务员。我回答他客店住满了。他“哦”了一声，然后说：“也好，帮我看着化肥，别让人偷了，我有次就被偷了两袋回去交不了差。”我们又躺下了。

不一会儿听见驾驶室车门响了一下：难道真有人偷东西？杜宗先立马爬起来到前边去看，接着用手指在嘴边做个不要出声的动作，招手叫我们。我们悄悄爬着前去，透过驾驶室后边玻璃，看见月光下司机正裸身把那姑娘压在座位上耸动着，姑娘抑制不住地小声呻吟。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景，顿时血脉贲张。我赶快又爬回去，做手势叫大家都别看了，心里真替这位女孩难过：那男人足可以给她当父亲了。后来想起又真有些后怕：如果我们三个男生没有强爬上车，那被司机准许上车的两个女知青在途中是否会遭遇美女服务员这样的待遇？……

天亮以后，车队出发直奔巴中，十点左右到达城里。下车后，没有去公社的车，大家一咬牙：一千二百公里的路都过来了，剩下这八十里山路咱们走回去！于是赶快吃饭，每人再买一个烧饼就上路了。晚上八点多钟，我们终于翻过最后一个山梁，林场就在下边。尽管身体疲惫至极，我们仍激动万分：终于平安回来了！

回顾这一路的经历，我痛感古人说得对：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

【书海泛舟】

## 遭遇武斗

（《文学朝圣之旅》选读）

郭久麟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四川外语学院退休教授、传记文学作家郭久麟尚未公开出版的自传《文学朝圣之旅》。作者在文革爆发时是1965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

川外学生开始响应号召，批判学校领导，抓出了学校的三家村、四家店：王炳申、张云亭、群懿、刘华伯等，川外的教师、学生在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八二六战斗团（反到底派）和星火燎原纵队（八一五派），两派之间还有一派“徐光明派”，偏向于八二六，但又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一派人很少，好像只有林亚光写大字报，落名为“得宽余”战斗队。

汉语教研室王家齐老师告诉我，川外的领导都是老革命，都是从部队来的，没有什么叛徒、特务，都是打不倒的。今后都会解放，重新当干部。你就参加八

一五吧！

汉语教研室任时文老师则对我说：你看，学生大多数都是八二六，领导干部也比较倾向于他们，你就参加八二六吧！

我觉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领导大多数都是好的，但是，两派都可能混入坏人，也都可能做一些坏事。我哪一派也不愿得罪，哪一派也不愿加入。

但是，在当时两派已经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不参加一派又似乎不行。我觉得自己还是更相信部队和中央任命的市革筹组，于是加入了八一五派，参加了星火燎原组织的学习和活动。

但是，我对运动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绝不因参加了一派就完全听他们的，我对自己这派的一些派性活动又很不满意，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一有武斗，我就回到市中区家中看书写作。

### 江老师被抄家

一天早上，我照旧在食堂买了稀饭、馒头，去到食堂旁边一栋三层楼的教师宿舍二楼江浩荡老师家。他是学校的体育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已四十多岁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个对象，是北碚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因为女老师周末才回来，平时都是江老师一个人住，所以我们几个男老师三餐都打好饭端着碗到他家里吃，一面吹牛聊天。但是，那天一走到他家门口，却看见门已打开，屋内乱作一团——他被抄家了！一会儿，其他几位经常到他家吃饭的老师也来了，大家这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被抄家的，原因是：他 1950 年在川外教书时，听说他母亲被划成地主，他觉得母亲只有十来亩地，她一个人做不下来，只好请一两个帮工。她自己也要劳动，怎么算地主呢？最多算是富裕中农。他就此事写了一封信给家乡土改工作队。他寄信前给当时宣传部长刘华伯看一看，刘华伯觉得这封信不能发，发出之后不但母亲要罪加一等，他本人也要犯大错误！他就没有寄出去。这次清档案，发现了这封信，说这是为地主阶级说情，反对土地改革，就抄了他的家！明天还要开他的批斗会！

不一会，他的年轻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从郊外赶来，一见这被抄得凌乱不堪的家，顿时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忙着劝她。这时，政工干部来了，见了她，就严肃地说：江浩荡问题严重，你得跟他划清界限，跟他离婚，把孩子打了！

她一听，更伤心了，哽咽着说：老江四十多岁才同我结婚，怀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同我离了婚，他就一辈子没有孩子了！……我不能同他离婚呀！

我觉得这位政工干部太无情义！江老师犯了什么法？他仅仅是对当地土改工作队划分阶级成份有点不同看法，想写封信反映情况，这本身就没有什么错！

——因为每个人都有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权利！更何况他还没有交出这封信，是交给了党组织。几十年后，还有什么错？就算有点错，也只是认识上的一点错，够不上反革命罪，更够不上要判刑、杀头，凭什么要动员他的爱人同他离婚？

等政工干部一走，我们几个老师全都劝她不要同江老师离婚，劝她把孩子生下来，好好带大！有什么困难，江老师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

她听了我们的劝，擦干了眼泪，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绝不同江老师离婚！我们怕政工组的又来找她的麻烦，劝她赶快回去，保养好身体。

还好，江老师的爱人听了我们的意见，没有离婚，还生下了这个孩子。文革后，江浩荡成了知名教授，国家级裁判。他多次申请入党，请我作他的介绍人。我也多次给党支部反映，希望能让他这位老知识分子入党，但几次支部讨论时都因有一两个党员反对，通不过，让他终生也未能入党，真是太令江老师伤感了！他的女儿长大后，跟着江老师，同我也很友好。

### 抗议“群众专政”

第二天，果然召开了江浩荡的批判会。一些人上台批判他包庇地主，反对土地改革，反正莫名其妙地给他栽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我越听越气愤。

谁知，一个更令人愤慨而荒谬且荒唐的事情出现了！

一个职员模样的中年人上台，说，我要揭发周永企的罪行！

这句话一下把大家的视线引到了周永企身上。周永企是一个职员，个儿瘦小瘦小的，爱说笑话，逗趣的话，没个正经。他犯什么罪了？大家都一头雾水。

这个中年人说，周永企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话更把大家吓坏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可是死罪啊！他怎么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这个中年人说，昨天在院坝乘凉时，有个娃儿问，谁的寿命最长？周永企竟然说：乌龟千年，王八百岁！我们天天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这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他这话，差点把全场师生逗得捧腹大笑！因为，谁都知道，周永企回答小孩的问话，说的是群众中的俗语，怎么把他说成是攻击毛主席呢！但是，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大家又不敢笑出声，拼命压住自己。有的用手捂住嘴，怕笑出了声，有的怕别人看见自己笑，忙把腰弯了下去，有的睁大眼盯着台上的揭发人，看他的稀奇表演。我是又笑又气又恨，笑这个上台揭发人的家伙的无知无聊无耻，气这个人不是个东西，恨这个人如此整人害人！

主持会议的人也觉得太无聊，但又不敢得罪他呀！于是说，对周永企攻击伟

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罪行，我们要彻底批判！专门开会批判！

散会时，八一五派头头宣布，现在，把牛鬼蛇神抓出去，实行群众专政！

他这命令一下，只见几十个造反派同学冲到主席台前，把站在主席台下十几个弯成九十度角的院长、书记、教授、专家，像拎小鸡一样，像赶牲口一般，抓着、揉着、推着、拽着，全部弄到会堂门外靠墙站成一排，弯腰低头地佝偻着，战战兢兢地瑟缩着，而十几个五大三粗的学生，则举着皮鞭、棍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站在他们面前。

随着一声口令：“群众专政开始！”这些昔日的学生的皮鞭、棍棒和拳头、脚尖，就立即雨点般打在了昔日的领导和老师身上！

这是怎样令我终生难忘的、惨痛的、残酷的一幕呀！皮鞭、棍棒和拳头在挥舞，脚尖在乱踢，老人们在痛苦地呻吟和哀嚎！这就是“群众专政”？这就是“触及灵魂”？这就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我实在不忍看下去！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残酷而荒诞的现实！

接着就开会学习。我们机关教职工一组（整个文革中我们汉语教研室的归属就一直定在机关），我十分痛苦而愤慨地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今天我们的群众专政却是武斗，是肉体摧残！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这样做！

旁边一个老师碰了我的胳膊一下，悄声说，你谨防遭整哟！

我回答他，群众专政，不应该是摧残皮肉！

这个老师说：现在到处都是这样！

我说，错的就不应该坚持嘛！

我俩正在争论，只见刚才主持会议的原来膳食科的杨科长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我们星火燎原纵队的一个头头，法语系三年级的学生，说是西南局一个高干的儿子。这个头头北方汉子的身材，穿着黄色军装，身上背着手枪带，杀气腾腾地走到会场中一站，把手枪举起来一挥，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儿有人说不可以打那些牛鬼蛇神！哼！老子就是要触及他们的皮肉！

他把手枪一挥，指着我的头，扣着板机，威风凛凛地说：我看哪个还敢再乱说！老子一枪毙了他！

我一时被吓坏了。我不敢、也不能跟他争辩，因为他有手枪！而且跟这些人，也不值得、不屑于跟他争辩，因为他现在根本就不可理喻！这个头头，从来是无法无天。他拿的手枪，真的是敢开枪的！死在他手下，太不值得！我的生命还有更大的作用！

我侧过头去，没理睬他。

他耀武扬威地旋了一圈，得意洋洋地走了。

但是，他却把一个凶狠的、无知的、丑恶的形象，留在了我的眼里和心里。

## 不当派头头

我住在西师原文化村六舍二楼。与西师的老师们离得很近。西师著名的吴宓教授就住在我旁边的一号楼二楼上。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没有跟他说过话。我同西师谭老师熟了，他是西师中文系毕业后考入武大中文系读的研究生。他经常印一些内部资料发给大家，如毛主席喜欢的古典诗歌等。文革后调到川大当出版社社长，我的《文学创作灵感论》一书就是他任社长时支持出版的。

一天，我们八一五派的潘老师突然很高兴地告诉我：久麟，你已被选为星火燎原的勤务员了。

我一听，头都大了：什么？勤务员？我不当！

潘老师说：那怎么行？大家都把你选出来了。你可不能辜负大家。

我想，糟啦！他们就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去为他们这一派卖力！但是，现在两派斗争如火如荼，眼看会进入武斗，我如果当了勤务员，就必然要跟王桐、金光中、丁易之这些人裹在一起，要带领我们派的人去同对立派作战，甚至还要去指挥武斗，那会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步？双方都是革命群众，同对立面斗争，又有什么结果？我绝不能当派头头，绝不能当什么勤务员！

怎么办呢？大家已经选了你，你不当，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我走了，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我回家给父亲、母亲告别，并告诉他们我想去外地旅游。妈妈说，正好，我们单位正动员大串连的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我们有很多票，发给返回北京、上海的学生，我给你领一张到北京的返程票。我好想到北京旅游啊！我立即约了川外俄语系 1965 年毕业的陈世富一起去北京。

就在我们走的那天，西师的两派就开始在新图书馆楼发生了小型的武斗。我感到我走是对的！

我们乘火车到了北京，我就带世富住在清华大学的表弟傅鸿源寝室。傅鸿源是我大姨妈的大儿子，也是我二妹久德在一中时的同班同学，1965 年考入清华（久德则考入川农），他姐姐傅鸿慧是 1960 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她也经常来看我。我们早餐在清华吃，饭后我和陈世富就去北京的各个景点玩。我们有计划地游览了长城、颐和园、十三陵、故宫、天坛、地坛等名胜，我们还去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顶洞人遗址参观。

我被北京古老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文化所震撼、所吸引，我被北京那些景点的壮丽而优雅的风情风景风物所陶醉了、所沉迷了！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起

床，七点多钟就出发，挤汽车赶到景点，慢慢欣赏着北京的风采。

当时，正处于大串连时期，坐火车、汽车都不要钱，进各个景点亦不要钱，在清华大学吃早晚饭也没花钱，只是中餐在餐厅吃饭要钱。我从重庆出发到北京时，只带了18元钱，因为我每月工资52.5元，每月给爸爸妈妈25元，出发前我已用了一些，身上只有18元钱了，我又不好向爸爸妈妈拿钱，也不愿再用他们的钱——而且他们可能也没有钱给我，所以我就只带了这点钱上北京。我们就是中午吃饭要用钱。当时物价极低，我们吃得又极简单。每顿吃三两饭（两分钱），吃一碗稀鲁汤（就是蛋花汤），一毛钱，或者吃一碗面，八分钱。所以，我这18元钱用到回重庆还没用完。

十来天以后，我们游览了北京的主要景点，晚上，在清华大学校园漫游，浏览一下大字报。有一天，我们突然在林立的大字报栏中看到了一条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标语：“重庆西师八三一革命派的数十名壮士跳楼牺牲！”

我们一下又被引回了重庆。这十多天，我们天天按计划游览着北京的胜景，几乎忘记了文革的风雨，重庆的武斗，想不到重庆竟然发生了这样惨烈的事件！我不太相信事态有这么严重——造反派肯定会添油加醋。但两派的武斗肯定比我们离开时更严重，却是不容置疑的！回去吧！“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异乡的风光再好，还是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啊！

于是，我们告别了北京，乘火车回重庆。

## 误陷武斗战场

回到重庆，已经是6月里了。回到重庆，才知道重庆已经是火辣辣的天气，而重庆的政治的温度、武斗的温度、派仗的温度，却比自然温度更高出几十倍！

我们在北京看到的传单上说的几十人跳楼是夸大其辞，但西师八三一和西师春雷的武斗确实非常严重。而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两派的高音喇叭在四周的高楼上互相唱着对台戏，互相诋毁着、谩骂着、批驳着、辩护着。解放碑的大街上，两派居民泾渭分明地坐在各自一派的广播下面，入迷地倾听着播音员或宣传家的讲解和嘶声呐喊。他们不断地为自己这派的讲述热烈鼓掌，而对对立面的讲述则给予无情的嘲讽和轻蔑的谩骂。两边都是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

我逍遥了。我不喜欢听那些充满了偏激情绪的、片面的报告和煽动。我开始回忆在澄江社教工作队的遭遇，把它们构思成短篇小说《红心永向毛泽东》。小说以我在农村社教工作队的经历为原始材料，写一个大学生毕业生，满怀热情和理想，到社教工作队，因发表支持“十六条”的意见，批评市委压制学生运动，被工作队批判，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得到解放，被请回去批判把他打成坏

人的工作队领导，他掌握政策，说服队长和书记，又不让被批判的队员搞变相体罚，赢得队长、书记尊重。这篇小说由一个朋友帮我刻印出来，征求意见，没有公开发表。

现在看，这篇小说显然是很幼稚的。不过它代表了我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我一心要在文学写作上有些成就，借这个不上课不上班的机会大量看书，读《红楼梦》第三遍，读《静静的顿河》（大学第五年级因搞社教，有些外国名著没有读完），读郭小川、贺敬之、李瑛、雁翼、梁上泉的诗……

一天，妈妈带我去市文联大舅舅杨世元家耍。他听说我在家赋闲，想让我跟他一起搞罗广斌的材料。他说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关进白公馆后，国民党在屠杀狱中革命志士时，没有杀他，让他逃跑出来。所以市委一直怀疑他的出狱有问题。他知道市委不相信他，文革一开始他就造市委的反，后来自杀了。现在市里要追查他的问题。

我觉得这事太复杂，不愿卷进去，加之市中区武斗很快升级，从我家人民公园到市文联两路口都有几个武斗据点，路上极不安全，妈妈也怕路上出危险，我就没有去。现在回想，幸亏没去，否则，参与整罗广斌，不仅浪费了自己的心血和时间，而且还会得罪多少文学界的朋友啊！

我四爸郭慎来我家耍，看到我在家里看书写作，就请我去帮他办《化工战报》。他说我可以吃住都在他们机关。反正闲着也没事，就去办报吧！我住在化工局机关，四爸是化工系统八一五派的一个头头，他把他们写好的文章给我，让我校对编排。我看报上有揭批原化工局长刘隆华的文章。我把报纸编辑、审校之后，四爸叫我把稿子带到长寿化工厂去印。我就搭乘汽车，去到长寿化工厂，交给他们印刷厂的同志，等他们几天后印出报纸，又由我带回渝中区，交给四爸。

我离开川外已经两个多月，既没有工资，又没有衣服换，我决定回川外去领工资，拿衣服。谁知，我坐的公交车刚开进北碚汽车站，突然一群人戴着藤帽、提着钢钎，包围了我们，把车扣下，不准开了。然后把乘客赶下车。下车后，我从文星湾走向川外，要回校拿衣服。

路上看到几个手持钢钎的五大三粗的工人在随意检查行人，我不满地说：你凭什么搜查过路人？你们有搜查证吗？

他们一听，立即火了。其中一个马上把钢钎对准我：哼！哪一派的，还敢盘查老子！说，是不是反到底的？

我说，不是，是八一五的！

他口气软了一点：哪个来证明？

我说，我凭什么要给你证明？

拿钢钎的家伙火了，凶狠地说：你他妈还犟哩，把他押起来！



几个家伙就举起钢钎把我押起来往重纺五厂大门走去。

刚巧，从前面走来一队手持钢钎的人，其中一个人喊起来：郭老师！郭老师！我一看，原来是川外六九级的学生，还有我认识的两个年轻教师。

我急忙说：他们说我不是八一五的！

我认识的师生忙跑过来，对几个巡逻的说：他是我们老师，八一五的！

他们拥着我，走进重纺五厂。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星火燎原纵队的，现在正好到重纺五厂来，看到了我，叫我就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干。他们还说，现在川外是反到底占据着，你回校去危险，而且也领不了工资！

我看他们手上提着钢筋改制的钢钎，头戴藤帽，前胸后背都吊着一块汽油桶圆底做成的护胸，样子挺滑稽的。我看他们把钢钎的头都磨得很尖利的，有的还在钢钎顶上制了倒钩。

我真担心他们这样是会杀死人的！我想，我绝不能参加他们的武斗！既然回不了学校，领不了工资，那明天赶紧找车回城里去吧！

下午，重纺五厂的两个造反派勤务员来带我去看烈士的遗体。我是好奇的人，又没事可干，就随他们去了。遗体存放在一间小屋里。看后，令人心悸不安。这是一个孕妇，光光的大肚子被刀剖开了，凝着浓黑的鲜血。尸体旁放着几块冰砖，一群绿头苍蝇围着尸体嗡嗡乱飞，恐怖极了。

两个勤务员指着遗体愤慨地说：她就是被砸匪杀死的！前两天，她在值班，砸匪冲进厂了，她忙跑去打钟报警。砸匪追她，她坚持跑拢，敲响了报警的钟声。砸匪就残酷地杀死了她！几个学生显得很气愤。一个勤务员说，哼！砸匪打来，你不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

啊，这不是在煽动武斗吗？武斗的歇斯底里，不就是这样被煽动起来的吗？我心头不禁毛骨悚然：现在，两派都把对立面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怎么得了？北碚、重庆、四川，哪儿不是两派？全国各省，又哪儿不是两派？这样斗下去，打下去，怎么得了？那不成了内乱、内战了吗？

我为自己没有当勤务员而庆幸！要是我当了川外八一五星火燎原的勤务员，现在不是正在指挥部指挥和策划武斗吗？多么可怕！

此刻，我忧心忡忡，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为川外的前途担忧，为重庆的前途担忧，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而我的这些担忧，又不能给任何人说。

我说我城里有工作，有事情，不能留在这儿，一定要回去。

他们说，公共汽车已经停开了。你只有明天再坐下水船了。

万万没想到，这一留，差点把命都留在了这儿！

当天晚上，腥红的晚霞刚刚落进缙云山的怀抱，重纺五厂的广播突然响起著名音乐家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斗志昂扬的进行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语录歌一完，就是播音员尖锐而亢奋的声音：

“八一五派的战友们，猛虎团的砸匪前来进攻我捍红总部了！大家快拿起武器，反击呀！”紧接着广播里又播放劫夫的这首进行曲。

全厂的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戴上头盔，抓起钢钎，前胸后背系上汽油桶圆底做成的“铠甲”，冲上前线，冲向厂区面向川外的后门。他们一路吼着：弟兄们，快冲啊！

一个瘦弱的小个子学生提着根长长的钢钎走过我面前，对我说：郭老师，快找一根钢钎！不然，猛虎团杀来，你怎么办？说完，步履匆匆地冲过去了。

我在心头暗暗叫苦！悔不该从安宁的家里来川外，来到这武斗战场，陷入“武斗漩涡”！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听着广播里高亢刺耳的音乐声，听着厂区门口的厮杀声和铁器碰击声，我心中不寒而栗：要是“猛虎团”杀进来，我不是会同我们这派的人一样被抓、被审、被杀吗？

我在厂区内焦急地徘徊。

一会儿，从厂区后门两个工人抬进来一个伤员，他们一人抬脚，一人抬上半身，见了我，大声喊道：“快，去叫医生！”

我急忙跑到医务室，高喊着：“医生，快去救伤员！”医生抓起医药箱就跟着我跑。见到抬下来的伤员，医生见伤员肚子上鲜血淋漓，忙叫停下来。两个工人忙把伤员放在地上。医生立即上前检查。我一看，这正是刚才喊我抓一根钢钎护身的那个瘦小的学生！

医生用手摸了摸脉，又看了看瞳孔，再用听诊器听了听心音，木然地向我们摆了摆手：“已经没气了！”

“啊，没气了？”我的心陡然一沉，一阵哀痛！一个活蹦乱跳的学生，就这样悲惨地去世了！他是哪里的人？他的爸爸妈妈在哪儿？他恋爱过吗？有女朋友吗？他爸爸妈妈知道他去世了，该有多悲伤？是谁杀死了他？他的死是谁的罪过？……

我一会儿也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吗？……

我脑子里杂乱无章，痛苦茫然……我流着泪，同医生和两个工人一起，把学生的遗体抬到医务室旁的一间小屋里。

两位工人又回前线去了。我仍在医务室旁焦虑地游荡，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空气是无比地闷热，星星闪烁着诡谲的眼睛。

高音喇叭声，喊杀声，搅乱着我的思绪：我怎么办？怎么办？

工厂后门又传来一阵喧哗声。只见三个工人押着一个俘虏走进来。再一细看，

这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娇小美丽的姑娘！两个赳赳武夫样的中年男人恶狠狠地左右两边扭着她雪白的、纤细的胳膊；后面一个满脸横肉、皮肤黝黑的壮年男人左手提着钢钎，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地捶打着姑娘的背心，还不时用脚尖猛踢她的屁股，并恶毒而粗野地谩骂着：捶死你狗日的砸种！捶死你！狗日的砸种！……

女大学生头发凌乱地纷披着，衣服被撕烂，痛楚地咬着牙关，忍受着这凶残的折磨！

一股愤慨和痛惜之情勃然而起，我两步冲向前去，对那打人的工人大喝一声：“不许打人！”

那个工人吓了一跳，双手抖擞了一下，慌忙停住了打人的手脚。他惊诧地抬起头，看到我是一个斯文的眼镜书生，立即改换成轻蔑和愤懑的眼色：“不打她？老子还要一钢钎捅死她！”

说着，他两手握住钢钎，对准了姑娘的背心，做出要刺出去的姿势。

我见状大惊，生怕他一钎刺进姑娘的背心。我冲上去把他的钢钎往旁边一掀，义正词严地说道：“毛主席说：解放军要优待俘虏！你怎么这样虐待俘虏！”

这个工人耍横了！他一下把钢钎对准我胸口，无赖地说：“你龟儿子包庇砸匪，老子一钢钎捅死你！”

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一手挡开他的钢钎，对他喝道：“你敢！我是星火燎原战斗队的老师！你不能虐待俘虏呀！”

那工人气愤地说：“哼！不打她，你没见我们刚才被杀死的学生！”

我说：“你英雄，上前线哪！打赤手空拳的女人，算什么英雄！”

旁边两个扭着姑娘的工人见我正气凛然，忙对那个打人的凶手说：“黑三！别吵了，你回去吧！”

黑三见同伙也不帮他，像个泄了气的气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拖着钢钎，灰溜溜地返身回了“前线”。

两个工人又反扭着姑娘的手，押着姑娘向厂区走去。

我痛惜地看着这个女学生被押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她会被押向哪里？什么样的悲惨的命运在等着她？这么年轻柔弱漂亮娇美的大学生，谁让她放弃了幸福的学习生活，提起钢钎，卷进武斗，自己又惨遭蹂躏？这些被派性充塞了心灵，被仇恨扭曲了人性的造反者，会怎样对待她？她会被毒打吗？她会被侮辱甚至奸污吗？她有男朋友吗？她的爸爸妈妈在哪里？知不知道自己心爱的宝贝、盛开的鲜花已沦入了污浊的泥沟、残酷的地狱之中了！

我不禁又想起我的两个正在大学里闹“革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妹妹。她们该不会参与武斗，该不会被杀，被俘吧？

老天爷保佑她们！也保佑我吧！我现在也误入了武斗的战场、武斗的漩涡，

我的命运又是什么？我亲眼看见了我们这一派的人被对立派杀死，又亲眼看见了我们这一派的人是怎么虐待对立派的女俘虏的！一会儿，要是猛虎团打进来，我不也成了俘虏？那我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摧残呢？我们队伍里的女同学，又会面临怎样的凌辱和折磨呢？

我想着，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武斗的现场，我一定要写出这血淋淋的一切！

一会儿，广播里传来了欢快的乐曲，播音员用得意的、欣喜的、豪迈的语气大声宣布：我们胜利了！砸匪被打败了！

我们川外星火燎原纵队的同学们“凯旋”了！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满身污渍、血斑，有的还挂了花，带了彩。他们欢笑着、摆谈着、夸耀着、诅咒着、谩骂着，大碗大碗地喝着食堂抬出来的稀饭，然后各人找一个地方，或一张桌子、一条凳子，或铺一块布、一张纸，或靠着钢钎、盾牌，枕着左手、右手，不分男男女女，胡乱躺下，很快就入睡了，打起呼噜来了。

我却久久睡不着。半夜了，山城的夜晚都还没退热。我看着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地鼾睡着的男男女女，看着那混乱肮脏、狼藉不堪的厂区，感到说不出的悲哀。这是怎样的“战地黄花”呀！是什么扭曲了我们的人性？是什么使人们丧失了善良、天真、纯洁和美好，投入到这相互残杀、相互伤害的内战之中？这是怎样的迷误和可悲呀！历史，该怎样回忆和评价这一切呢？

我绝不能呆在这儿！哪怕是一天！明天我必须走！离开这残酷而危险的战场！

第二天一早，吃了馒头稀饭，我就要离开工厂了。川外的老师和同学都劝我留下来，同他们一起战斗。有几个女同学还反激我，说我怕死，不敢留下来参加武斗。可是，无论老师和同学怎么劝，我都坚持说我城里有事，必须回去。我心想：留在这儿参加武斗会是什么下场？如果你在武斗中杀死了对立派的同学或工人，你以后说得清楚吗？你灵魂会安宁吗？以后会不会被劳改判刑？如果你在武斗中被人杀死了，或被杀成了残疾，你值得吗？我是人民教师，我怎么可能拿起钢钎刺向自己的学生、老师同事和工人朋友！这是非之地，这血腥的战场，我绝不能呆，更不能留！但是，我又不能说出我的思考，我只能说我在城里有另外的任务，必须赶回去！

但是，当我赶到汽车站，我懵了：往日喧嚣热闹、熙来攘往的人群聚集之地，往日繁忙嘈杂、车来人往的汽车盘旋之地，竟然空无一人！竟然空无一车！

我只好改走水路。赶到嘉陵江边的北碚水码头，已有好些人在等船了。等了很久，终于看到嘉陵江上游驶下来一艘轮船，靠向趸船——这应该是从合川到重庆的客船。人们立即蜂拥着跑向趸船。我也高兴地挤进人群中，心想：这下好了！可以平安回到重庆了。

谁知，就在这时，码头上突然出现一队武装人员，他们一个个手持钢钎，头

戴藤帽，迅速向趸船冲来，一面冲，一面高喊：“让开！让开！”乘客们吓得四面散开，码头上一片混乱。手持钢钎的武装人员全都戴着“捍红总部”的红袖章。他们闯上趸船，冲进客轮，把船上的乘客全部赶了下来，在轮船上插上“捍红总部”的旗帜，然后对大家喊了几声：船不走了！

这下，我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回重庆了！我彻底地失望了！

怎么办？回重纺五厂去？不！绝不！我就是爬，也要离开这血腥的、残酷的战场！

我决定步行回城！我顶着炙热的骄阳，从上午九点钟一直走到下午五点多钟，走得精疲力尽，走得脚酸腿软，终于走到沙坪坝，乘上了沙坪坝到重庆的16路公共汽车，回到了我的家——我爸爸妈妈位于人民公园九号的温暖而宁馨的家。

## 亲见枪炮对战

回到家中，我又开始看书写作。正所谓“躲进小楼钻学问，管它派性斗翻天”。我把萧洛霍夫四卷集的《静静的顿河》又看了一遍，又反复读唐诗、宋词、元曲，反复读贺敬之、郭小川的诗。同时，我也写诗、写小说。我写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诗，寄到《重庆日报》上发表了。后来我知道了，副刊主编胡松荣是川大中文系63级的毕业生，是我的校友，所以我的诗他基本上都给我刊用了。

我还把我在北碚陷入武斗场合的见闻写成小说，取名《劫难中的爱》。我以在文星湾武斗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武斗的血腥和丑恶，也写出了我对武斗的反感和憎恶。我对被俘虏的女学生的命运作了揣测和安排，并让“我”参与其中：我虚构她被俘虏她的两名男工人抓去，欲侮辱她，被“我”跟踪发现，救出女生，一起逃到嘉陵江边，造反派追来，“我”们躲进一只渡船，划向长河下方……当然，这篇小说也从未寄出发表。

1967年的那个夏天，我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在三十七八度高温的家中，写着、读着。那时候，由于武斗，粮食、蔬菜、煤炭都经常运不进城。城里经常没有粮食、蔬菜、煤炭供应。我们经常没有蔬菜吃，只能经常吃咸菜。记得有一次，好久都没有煤卖了。有一天，突然听说朝天门运来了几车煤炭，我和弟弟、舅舅赶忙挑着空筐赶到朝天门。只见几部军车运来了满满的煤炭，煤一卸下来，大家拿起筐子就装煤，那场面简直就是抢煤！好像也没有给钱，甚至于没有人收钱！解放军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枪林弹雨中，从矿区把煤炭抢运到城里来的！

重庆市中区也不安静了。原来在解放碑周围展开的两派辩论，逐渐由语言变成了枪炮！也就是说，两派在各自的楼房都架起了枪，时不时瞄准对方射击。过

路的行人常常被无辜打死。解放碑旁边就有一具怀孕的大肚子女人的尸体躺了好多天都无人去收尸！

枪炮在街道间对射，给我们居民增加了无比的忧虑和恐惧。我们不得不把棉絮挂在窗户上，以防流弹射进屋里打死人。

这天下午，我正在家中读书，突然外面传来隆隆的炮声。我赶忙跑到院坝，只见长江江面上有两艘轮船正在向上游驶来，它们一面行驶，一面向两岸开炮。我躲在院坝的矮矮的石墙后面，抬起头下看，原来是造反派抢了船，在左右舷舱上安装上大炮，把客船变成了炮舰！他们耀武扬威地、肆无忌惮地向两岸发射着炮弹，炫耀着武力，伤害着无辜的老百姓！

这是怎样的世界呀！什么人可以这样凶狠地朝老百姓开枪开炮！我们的解放军呢？为什么不出来管一管？！

怀着这样的疑问和不满，当天晚饭后，我到离我家只有几百公尺的重庆军分区司令部去询问。他们的一位指导员出来接待了我。

我有些不满地质问：“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保卫人民群众的。现在，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街上到处打枪，昨天有人把炮舰都开进长江向两岸打炮！你们为什么不管？！”

那位指导员静静地听完我的埋怨和批评，然后无奈地说：“我们怎么不想管呢？可是，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对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造反派还抢我们的枪，抢我们的炮，甚至打死我们的战士，击沉我们去制止武斗的交通艇！我们都不能还手。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大吃一惊，更大惑不解，瞪大迷惑的眼睛问：“什么？他们敢于抢你们的枪？抢你们的炮？打死解放军战士？击沉解放军的交通艇？而你们却不敢管？不能还击？”

指导员也痛心地说：“是啊，就是前些天，我们的交通艇到望江厂制止武斗，被他们打沉了！我们正在打捞！”

我一听，心都冷了半截！现在整个社会分裂为敌对的两派，由嘴巴、笔头作战，到用拳头、枪炮作战，人民群众生活没有保障，生命没有保障；解放军的枪被抢，战士被打死，交通艇被击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报纸上公布老人家的“最新指示”却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真不知道老人家是怎么想的，怎么搞的！？我的信仰和崇拜之情，开始动摇了！

#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 新增内容选读

何 蜀

说明：《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于2010年8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初版。后来我在帮助重庆文革时的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木森和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阳增泰、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八一五派女委员黄荣华等整理回忆录时，陆续了解到一些新情况，找到一些新史料，在2011年到2013年间参与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与重庆市图书馆共同进行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中，又接触了解到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亲历者，其中许多是当年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或骨干，听他们讲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以及传单、小报上未见登载的情况，便决定在文革题材书籍越来越难出版的这一“冰封时期”静下心来，再作一次深入的修订。在修订中增写了一些内容，现将第四章中增写的《重庆市委从转入“地下”到完全瘫痪》、《五十四军军长被造反的红卫兵绑架》、《驻军党委填补重庆市委瘫痪之后的权力空白》；第七章中增写的《“全面内战”的大背景：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两派都打开了军火库》（将原《反到底派打开了军火库》一节改写，增加了八一五派打开军火库内容）、《两败俱伤的北碚“八四”事件》、《八一五派攻占嘉陵机器厂》、《关于重庆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多发炮弹”》等小节先发表出来征求意见，以便继续修改完善。

### 重庆市委从转入“地下”到完全瘫痪

#### （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一节）

1966年底，特别是在“一二·四”事件之后，重庆市委已经真正是“威风扫地”，被造反派称为“黑市委”，很难开展工作，基本转入“地下”状态。

市委书记处书记岳林在1967年初写的一篇公开检查中说：（1966年底）“市委办公厅周炳林向我反映，市委有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市公安局，怎么办？当时我同意拿回来，不能放在公安机关。在未拿回来之前，大约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晚上，书记处碰头会上（书记全部在场），廖苏华又提出这个问题，鲁大东同意该保存的保存，该处理的就烧掉，辛易之亦表示没有意见。”<sup>1</sup>

<sup>1</sup> 岳林《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1967年3月1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由此可见，在1966年12月底，重庆市委书记处还开过碰头会。

12月31日，重庆市委的舆论喉舌、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被报社造反派夺权。从次日（1967年1月1日）起改出《新闻报道》。

工人战斗军不甘心“一二·四”大会被造反派冲击而流产，决定在1967年1月4日（即“一二·四”事件“一周月”之际）再次召开大会，表现他们同样能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得知后，有人又准备再次对大会进行“造反”以制造事端，进一步打击保守派。重庆市委深感担忧。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1967年3月1日所写《初步检查》中说：“一月二日在说服工人战斗军不要开会时，一方面批评他们思想保守，应该向革命派学习，一方面又从物资上解决问题，没有勇气拒绝。”<sup>1</sup>

可见直到1967年1月初，辛易之还在以市委书记身份做工作和批条子。

然而，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已经掀起。1月6日，最早发生学生与市委领导人正面冲突的“八一五”事件、最早起来造反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院校所在的沙坪坝区，造反派与区委机关“七一”战斗队、区人委机关“星星之火”战斗队宣布夺了区委、区人委的权。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26日改称沙坪坝区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区临委）。这是重庆市第一个区委及区政府被造反派夺权，彻底脱离了重庆市委的领导。

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去贺电，表明了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确态度。这一信息使重庆市委领导们对形势彻底打消了犹豫观望态度，辛易之在向群众所作的《初步检查》中说：“这时感到形势逼人，再不能拖了，必须从思想上彻底弄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月16日，造反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布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总攻击动员令》。同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勒令“黑市委”领导人到重庆大学报到接受批判。

对重庆市委领导人在1967年1月上、中旬的行踪，有一份历史资料作了具体记载。1967年4月初，因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发表“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中称：“一月十七日深夜，在（重庆）市委交际处，黑市委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公安局长孙斌和重大八一五总团周××黄××熊××密谈”搞“和平让权”。重庆市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丛中笑”战斗组于4月17日发出一份传单《紧急辟谣》，说，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从1966年12月已“杀出来”造反，

<sup>1</sup> 辛易之《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1967年3月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不存在 1967 年 1 月 17 日“黑市委”与重大八一五头头在交际处开会密谈的事，在这份传单中还详细列举了“黑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的行踪：

鲁大东——于元月二日乘汽车去成都，四日乘机赴京（引者注：鲁大东 1967 年 3 月 4 日《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中说：“今年一月我去北京动员工人纠察队返回重庆搞生产……”），元月二十三日下午由京返蓉，二十四日晚回渝。

辛易之——元月八日去重庆日报，十三日由报社与交院九·一五同学刘××、中学生红卫兵陈××、何×，北航红旗马××、北地东方红朱×一同去交院九·一五，元月十九日由交院刘××、肖××与辛一道去綦江铁矿。元月二十二日晨一时从綦江返交院，元月二十二日去大田湾开会，会未开成，后由电力学校带去约十多天，又由交院刘××带回交院九·一五，直至二月二十四日市委造反派才要回交“革联会”。

廖苏华——因元月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了要黑市委头头到重大报到的《勒令》后，于十七日晚七时，廖从人事局处乘车去重大报到，十八日，市公安局造反派曾带回市局交待问题，后仍送回重大，直至二月下旬才送交“革联会”。

从这份资料可知，重庆市委书记处的领导们，先后于 1967 年 1 月上、中旬停止工作。重庆市委至此完全瘫痪。

## 五十四军军长被造反的红卫兵绑架

### （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六节）

驻重庆的陆军第五十四军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军长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韦统泰与军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因奉命给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俗称“思想兵”）当辅导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也遭到批判，特别是遭到“思想兵”原负责人中的刘桂兰、孟军等学生的造反，被搞得灰溜溜地说不起话，因为当时官方宣传的调子都是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初，毛泽东还没有发布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号令，所以韦统泰、梁大门对这些批判只好不表态，不作任何公开回应。可是造反的红卫兵决不罢休，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所教导的“不破不立”，必须把“反动的东西”批倒批臭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于是，便发生了堂堂军长韦统泰（取消军衔制度之前的原军衔为少将）被造反的红卫兵绑架的戏剧性事件。

1967 年 1 月 8 日，星期天，农历小寒节气刚过，但社会气候却热气腾腾：重

庆市沙坪坝区的造反派已经率先夺了区委和区人委的权，外地也传来上海的《文汇报》、成都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的消息。这天上午，被造反派讥称为“保皇四军”的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战斗军、文艺革命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到会人数不多，气氛压抑。

这时许多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一般人带有鄙夷意味地简称为“思想兵”）的成员都已经宣布“造反”。重庆师专附中的“思想兵”大多加入了该校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该组织不久与校内另一造反派组织红旗兵团联合组成了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在1月8日前两天，一些参加了师专附中八一五战斗团的原“思想兵”成员，在一个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的策动、组织下，去到五十四军军部即重庆警备司令部大门前，要求韦统泰、梁大门出来承认错误，不出来，他们就在门前静坐抗议。

参谋长耿志刚一看这些学生的来头有点不对，就对韦统泰说：“一号，还是我去见他们吧，你是军长，不能随便出去，有事我顶着。”

韦统泰摆摆手说：“他们非要见军长，我不出去不合适，难道我们还害怕群众吗？”

岂料，他刚走到营门接待室，就被围上来的十几名青年学生抬起来就走。警卫战士一看，一个个怒不可遏，不待命令，立即封住了军部大门。韦统泰担心战士们与学生代表发生冲突，就以命令的口气大声喊道：“把大门让开，谁也不许阻拦！”

他被抬上一辆大轿车，一条棉被把他捂得严严实实，开车就跑。

警卫连长气得发疯似地连哭带喊：“参谋长，你赶快下命令吧，我带人去把军长抢回来。”

耿志刚就像没有听到警卫连长的哭喊，拿起电话立即向谢政委汇报了情况。……耿志刚气愤地对谢政委说：“你给我一个连，我保证把军长找回来。”

谢家祥不急不慢地说：“我认为他们不会对老韦怎么样。如果派部队出去找，我最担心的是部队与青年学生发生冲突，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他们研究的结果，立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电。《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同志被红卫兵带走的情况报告》连夜传到北京。<sup>1</sup>

这是后来韦统泰在国防科工委和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时的秘书逯守标大校所写韦统泰传记中转述的当时情况，因向他回忆这一事件经过时，韦统泰年事已

---

<sup>1</sup>逯守标著《从书生到虎将——韦统泰将军》，411～41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高，可能会有某些细节的不准确清晰（比如是什么车，是否捂了棉被），但大体情节应该是清楚无误的，而且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从档案查阅到了这次绑架事件的具体日期：1967年1月8日，因当天五十四军党委即就此事向中央军委作了紧急报告。另外传记中没具体写到的情节还有：当时警卫连并未坐视军长被弄走，而是驱车紧紧跟随，一直跟到重庆市少年宫外面，看到学生们把军长簇拥进了少年宫，才向军部报告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韦统泰被学生们带到了设于重庆市少年宫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个红卫兵司令部最初设在枇杷山公园，但因那里地势高（是市中心的制高点），上下交通不方便，市文革办公室主动提议他们搬到枇杷山下大马路边的少年宫。原负责红卫兵司令部工作的是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搬到少年宫后，秦安全回学校去汇报，重大八一五总团正苦于总团工作人手不够，便把秦安全留下参加总团工作，让另一个喜欢在城里活动的勤务员周家瑜去管少年宫那边的事。少年宫原是国民党的最后一任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红卫兵司令部那幢楼房就是以前杨森一家的住所，文革以前是少年宫红少年艺术团各兴趣小组活动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

学生们安排韦统泰住进一个房间，生活上对他照顾得很好，对他就是一个要求：承认给“思想兵”担任辅导员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这个要求被韦统泰拒绝了，因为他担任“思想兵”辅导员是中共重庆市委提议后报经成都军区批准的组织决定，他是军人，执行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决不承认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平时，他还跟这些学生进行交谈，讲他的战争经历，讲一些战斗故事，也听学生们讲当前文革形势和他们为什么要向市委造反的原因。这些中学生跟他的子女年龄差不多——他的两个子女分别在重庆的一中、三中上中学，这时正在外地串联还没回家。其间，他给军部打了一个电话，报告了他在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

一方要求认错，一方拒不认错，这样僵持下去显然不是办法。韦统泰被软禁在少年宫两三天后，红卫兵方面不知谁想出了一个下台阶的办法：将韦统泰公开批判后送回军部。

一天晚上，红卫兵司令部在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解放碑下召开了“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韦统泰带到了大会上。大会安排了一些发言，特别是原“思想兵”的几个负责人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的名义作了一个联合发言《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自从刘桂兰、孟军公开宣布“造反”后，她们的联合发言一般都是刘桂兰排名在前，孟军排名在后，而这次孟军排名在前，估计是身为五十四军干部之女的刘桂兰不大好当着韦统泰军长的面作这样的发言，就让孟军出面宣读了她们的

发言稿。发言的主要内容马上摘录刊登到了1月15日出版的《山城红卫兵》报上，姑娘们对两位“辅导员”不再称“首长”，更不称“叔叔”，而是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

一个月以前，我们给韦统泰、梁大门写了封公开信。但至今毫无反应。甚至玩弄新的花招，想溜掉滑过去。告诉你们，这办不到！

你们在刘邓的反动路线指使下，在李井泉直接指使下，违反中央军委指示，与黑市委里勾外连，扼杀革命组织，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借“抓革命、促生产”之名，调动军队向革命群众示威，别有用心地让军队绕过重大门前。我们质问你们，梁却说：“林彪说要突出政治，劳动第二。”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吗？你们还对抗十六条，挑动学生斗学生，利用辅导员的合法身份，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变成了重庆黑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高喊“重庆市委不是前北京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派出十员干将以《战旗报》记者身份整理“八·一五”的材料，监视“八·一五”的行动，恨不得把“八·一五”吃掉。

……梁在谈话中说过：“怎么样？我们五八年从朝鲜回来就参加重庆市委，我们参加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参加黑帮的呀！”现在怎么样？韦统泰、梁大门，你们说呀！你们千方百计地保市委，结果怎样呢？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吗？

韦、梁二辅导员，十五期社论、元旦社论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现在和人民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背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老实实向人民作检查，站到毛主席的人民的立场上来，改正错误，那就还是好同志，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二类干部，如不然就会滑到与党、与人民对抗的地步。<sup>1</sup>

三位年轻姑娘的这个联合发言，现在来看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刘桂兰本人就是军队干部之女，其父就是韦统泰的部下。她们敢于这样表示对自己曾经崇敬的“首长”、“叔叔”的决裂，显然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为了表明自己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立场，在那个“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年代，为了“革命”，亲娘亲爹都可以不认，何况什么“首长”、“叔叔”！

她们的发言主要批判了梁大门的一些言行，但矛头是对着韦统泰与梁大门两位“思想兵辅导员”的，韦统泰当时是否听到了这个发言，听了这样的发言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不表态，不认错。双方僵持下去当然也不是办法。最后是怎样收场的？

---

<sup>1</sup>《老实交待是可以的 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载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山城红卫兵》第十期第4版，1967年1月15日出版。）

一位当年的目击者回忆了所见情况。这位目击者是一个初中女生，也是从“思想兵”中随时代大潮“反戈一击”参加造反派的，她当时正站在解放碑主席台旁边的台阶上，韦统泰被带上主席台时就从她身边走过：

那天是晚上，因为天很冷，我的印象很深，他穿的是军大衣，身材很魁梧，昂首挺胸，军人的风范很令人敬畏。那些人发言说了什么，我记不起了。我只是听到学生们发出声音，要韦统泰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韦统泰拒绝说，我没有错，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人呼口号，要求他低头认罪。他越不低头吼得越凶，当时就有人要冲上去了。这时，韦统泰的行为让大家有些惊讶，只见他一个标准的军人向后转的姿势，对着那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脱了军帽低下头来。这样子下面的人看到他向毛主席认罪就罢休了。我觉得他很有个性，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很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则，不轻易向台下人认罪。……那天他是被押去解放碑的，从我们一旁梯坎上去，被一群人押着走上台。他上去站在台上，就器宇轩昂地，站得笔挺笔挺的。那些人罗列他的罪状，他不说话。<sup>1</sup>

由于当时大形势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史无前例”的绑架事件并未导致重庆驻军与造反派之间更加尖锐的对立，反而促成了双方的沟通、了解。因韦统泰与造反派红卫兵有了多日近距离接触和对话，对这些与他儿女年龄相仿的“革命小将”有了进一步了解，进而认定这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热情支持的“革命小将”并不是什么“反革命”、“暴徒”，而是开展文革运动应该依靠的“左派”，从而在毛泽东有关军队“支左”的指示下达后，五十四军党委便迅速确定了支持当时已经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的立场。

## 驻军党委填补重庆市委瘫痪之后的权力空白

### （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七节）

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的第一句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在基层由各地、各级党组织来代表。但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1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地方各级中共组织受到冲击、相继瘫痪，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回答群众有关提问时曾勉为其难地抛出了一个新概念：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1966年12月5日陶铸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的讲话中就说：“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

---

<sup>1</sup> 谭海庆口述，2012年10月24日。

领导。党委如果很好，执行毛泽东思想，则就能代表党的领导，相反，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如果他执行了毛泽东思想，照样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你不能执行，他执行了么，党委不行了，你们就代表党委执行党的领导。”<sup>1</sup>

不过，群众组织毕竟不是党组织，在“党天下”的时代，完全没有基层党组织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当时在哪里还有基本未受冲击、保存最为健全的党组织系统？当然是军队。

陆军第五十四军军直机关驻重庆（兼重庆警备司令部，1967年10月起改称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政委谢家祥（军党委书记，1967年7月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是文革前夕当选的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五十四军是当时成都军区辖下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军级野战部队，其级别高于重庆市委，谢兼重庆市委常委是军队为联系地方工作方便而普遍采用的做法，并不表明谢的级别低于任白戈。

因为毛泽东有“党指挥枪”和军队不仅是战斗队同时还是“工作队”的一贯指示，重庆驻军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非从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时才开始。

1966年6月22日，《重庆日报》公布了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的重庆市委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重庆市委重新派出比前一工作组更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领导文革运动，新工作组由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任组长，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军党委常委）为政委。工作组人员包括地方干部约200人，军队干部约100人（即军人占三分之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8月3日，重庆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按中共中央通知，各校工作组必须于当天下午6时前撤出。重庆大学工作组临时撤到校内刚竣工的机械系新大楼，与师生脱离接触，等候指示。滞留至8月20日，工作组决定撤离重庆大学，但遭到重大师生阻拦，要求他们把有关郑思群之死等问题说清楚之后才能离开。工作组中的军队干部未受阻拦，全部撤回了部队。重庆驻军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启示和号召下，9月8日，得到市委支持的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同时，参照北京的先例（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给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担任辅导员），由重庆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军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军党委常委）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10个解放军“联络员”。9月10日，按照重庆市委的指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态度日益倾向造反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韦统泰等又成为毛泽东思想红

---

<sup>1</sup>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卫兵的辅导员。

这应算是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1966年10月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几位负责人——总部政委刘桂兰、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孟军、总部常委王桂香等也起来向市委造反，同时对解放军辅导员提出了批评。10月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宣布撤出（实际上等于是赶走）解放军辅导员。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的第二阶段又以灰溜溜撤出告终。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这时起，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党委就正式行使起全面领导重庆市文革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工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填补了原重庆市委瘫痪后形成的权力空白，发挥了中共在重庆地区的“领导核心”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既缺乏权威也缺乏执政能力的“领导核心”。

## “全面内战”的大背景——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

### （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四节）

对于全国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在1967年8月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这一史实，至今尚无官方史著披露相关的一个重要背景材料：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只有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多年后所著《王力反思录》中明确写出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细节：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发枪给群众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这两条都是这封信提出的。再加上过去搞的设立专案组是第三个大错误，比苏联的契卡还厉害。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这话总理和我都没往下传达。江青的“文攻武卫”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讲的，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起很坏作用的是那个“文攻武卫”。但是，也不能否认主席早在她讲话的三天前就讲了武装群众的问题。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

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把“六·六”通告等都推翻了。成了要群众来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与他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他生气了。这样做后患无穷。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在一张纸上正反面都写的。当时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陈伯达没抄，还叫我补抄一份。信中还提到夺枪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夺枪还不严重？毛主席这句开头说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我两年半前向中央领导写过信，建议对当时由部队发枪造成大规模武斗的，除别有用心的以外，不能按《刑法》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因为有“最高指示”。<sup>1</sup>

关于中央批准发枪“武装左派”，当年小报传单上多有报道，如上海小报上就有这样一则简讯：

### ▲北京师大井冈山民兵师宣告成立

八月十八日上午举行授枪仪式，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下面是谢副总理的批示：同意你们（指师大）自己五百支武装自卫，但背枪的人要选择。要训练。不能儿戏。<sup>2</sup>

文中的“五百支”显系“五百支枪”漏排了“枪”字。在原北京师大校友编写的《师劫》一书里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中对此也有记载：

8月18日，师大革委会发出公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井冈山民兵师。同时举行了授枪仪式。<sup>3</sup>

有关中央批准发枪“武装左派”，最早见于民间回忆记载的是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戴维堤（曾任“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负责人）所写长篇回忆录《逝

<sup>1</sup>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2—1013页。

<sup>2</sup> 上海《外贸战线》编辑部、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红卫兵师部政宣组、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红公社驻沪办事处主办的《文革通讯》第4期，1967年9月8日。

<sup>3</sup> 黎云编著《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511页。



者如斯》，书稿中专门有“中央武装北航红旗”一节，其中写道：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sup>1</sup>，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

……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sup>2</sup>

从戴维堤的回忆看，中央给北航红旗发枪时他本人不在场，但他回校后担任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负责人，因此对发枪一事的记述除日期不准确外，主要内容应是可信的。当年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韩爱晶对此的回忆更为准确：

1967年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纪念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开始前，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负责人向周恩来总理问这问那，周总理一一回答。

我跟周总理说，像我们北航，同学们出身好，队伍整齐，没分两大派，是不是给我们发枪，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

<sup>1</sup> 此一日期有误。在《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中记载为1967年8月16日。即比师大授枪仪式早两天。

<sup>2</sup> 戴维堤《逝者如斯》2004年8月终稿，网传电子版。

周总理连考虑都没考虑，当即点头说：“好！”

8月16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北航召开大会，发放两千多支枪。这是武装北航的由来。当时发给枪支没配备子弹。

以上情节，北航有关大事记有记载，小报也有报道。<sup>1</sup>

有了中央给北航红旗、北京师大井冈山发枪这一示范性的举动，下边发生的情况就很好理解了。按王力的回忆，毛泽东写于1967年8月4日的这封信，接着就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阅了，并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抄下来贯彻执行，显然“武装左派”这一精神很快就传达下去了。于是，在重庆周边当年尚属四川省辖的涪陵专区、万县专区及江津专区的专署所在地永川县（这些专区县市后来都已归属重庆直辖市），都陆续从8月6日开始了由支左部队发枪“武装左派”（即武装造反派）的行动。尽管至今没有官方史著明确记载这一当年人所共知的重要史实，但在一些亲历者回忆录中都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记载。

当年涪陵造反派忠实派红卫兵“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罗成胜，在其回忆录《我的造反生涯》中有这样的记述：

1967年8月5日深夜，已经由成都军区认定为涪陵地区保守派的红联司，在军分区一些人暗中支持下，突袭抢劫了军分区武器库的各种军用枪支5000余支，轻重机枪400余挺，迫击炮100多门，炮弹和子弹500多万发。8月6日凌晨4时左右，由正在当地从事地下核工程建设的工程兵建筑第五十四师（代号8342部队）副政委黄鹤寿担任组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紧急召集忠实派主要负责人开会，通报了红联司抢枪情况——

支左部队的首长，特别是黄鹤寿政委，明确地对我们讲：对于赵树金的这一犯罪行为，我们已经向成都军区报告，而且成都军区也明确的指示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的左派，可以武装左派，让你们自卫。根据这个指示，支左领导小组决定，为了应付万一，先从现在的支左部队的战士手中抽出一些武器武装你们。……先组织两个连队，一个连队由原地委、专署以及公安的干部组成，另一个连队由工人组成，武装人员政治上要可靠，最好是转业军人，要有使用武器的经验；忠实兵学生红卫兵这次不武装。<sup>2</sup>

当年四川省万县专区万县市的一个底层临时工谢声显，本来因“家庭出身”问题并未参加群众组织，却被保守派红色派诬为造反派的“探子”抓捕，险遭杀

<sup>1</sup> 韩爱晶 2020年8月2日对何蜀询问中央给北航红旗发枪一事的微信回复。

<sup>2</sup> 罗成胜《我的造反生涯》，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害，侥幸逃脱之后投奔到造反派聚集区，他回忆了1967年8月8日亲见的支左部队向造反派发枪的情景：

地委大院里已经沸腾起来，几幢大楼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人，便听见有人站在花坛上大声宣讲：“……前天，红色派抢了万县武装部和县中队的枪，支左小组派军官去制止，反而被他们刺伤了两个军人。枪到手之后，红色派便准备在10号左右发动总攻，将我们全部消灭。为了粉碎红色派的反革命进攻，支左小组火速请示了上级，昨晚开始给我们发枪。现在，我们已夺回了行署，正在攻打电影公司和党校……大反攻开始了！”下面就鼓掌欢呼起来。

……（吃过早饭）刚走出食堂，便见几个“赤旗”的女学生进来发传单。我们拿到的传单还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是学生们连夜印刷的，上面赫然写着：“周总理指示：万县、涪陵、泸州的造反派是经过考验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经中央决定，发枪武装……”看到中央这么明确的表态，人们都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大门外，一队全副武装的学生队伍从前线撤了下来。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手中的大刀钢钎全变成了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更平添了几分威武几分杀气。中学生虽然满身硝烟略显疲惫，但却队伍整齐神情兴奋。马路两边的人便为他们鼓掌，有人大声询问，队伍里便有高声应答：“电影公司拿下来了，我们轮换下来休息，猛虎团他们接着要打党校了。”没半点军事秘密的概念。

学生队伍刚过去，一辆解放牌货车突然风驰电掣般冲进了地委大院，在食堂外的空地上“嘎”地一个急刹车。人们从车窗里看见副驾驶座上的熊道生，大家又立即涌了过去。穿一身旧军装、腰挎手枪的“主力军”一号勤务员从驾驶室钻了出来，他喊了一声什么，混乱之中我没听清楚，但人群中却爆发出狂野的“枪，枪，枪！”的呼喊。这时，我看见货厢上有两个人正弯腰用铁撬棍在撬什么东西。我站上花坛一望，上面货厢里除了两个精壮汉子之外，装的都是军用长条木箱，有几个迫不及待的家伙便攀住货厢想往车上爬。熊道生此时和一位嘴角上有粒大黑痣的中年人已上了货厢，他大喊道：“不准上来，排队排队。”那位中年人便拔出手枪朝天“砰砰”开了两枪。没人再敢往车上爬了，但也没人排队，乱糟糟地围着汽车伸出双手嚷着：“给我枪！给我枪！”上面的人便一边撬木箱一边往下递枪。拿到枪的人笑逐颜开，马上便退出人群，后面的人立即又涌了上去，完全没有一点秩序……不过十多分钟，这满满一车步枪便全发完了。都是“文革”初期封存的民兵装备，三八大盖和中正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使用的武器。<sup>1</sup>

在当年曾到万县地区串联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张甦编写的《我们与万县》一书，

<sup>1</sup> 谢声显《黑与白的记忆——从文学青年到“文革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3—134页。

综合当年万县地区造反派主要负责人熊道生等人的回忆，对这次发枪也有一些具体记载：

按万县地区支左小组的指示，“主力军”、“赤旗”总部负责人编制了“万县地区民兵营”花名册，登记了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政治面貌并进行了核实；再上报支左小组审批。参加“民兵营”的，绝大多数为复员退伍军人，极少在校学生。枪是用大卡车拖到地委宾馆，按名册发放，从此我方也有真枪实弹了。枪支是从万县军分区后勤部拉来的，基本上都是基干民兵训练用的中正式、三八大盖等旧式武器，与“红联站”掌握的武器相比，差了一大截！所以，民兵营的战士便去万县军分区后勤部，要求换一批枪支，这样纠缠了好些天，终于换回十来支半自动步枪、两门六〇炮。

为了解放江城，万县地区支左小组组长张进师长在西山公园举行了民兵营成立大会，举行了庄严的授旗授枪仪式！任命熊道生同志为营长，冯天福、应维忠、冯国清为副营长；任命钟嘉钰为营教导员，谭德禄为副教导员，左文景为营参谋。还任命了各连连长和指导员。<sup>1</sup>

当年在四川省江津专区专署所在地永川县担任造反派红旗派主要负责人的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叶大明，在晚年所写回忆录中也回忆了驻军发枪武装红旗派的情况：

红旗派天天盼，月月盼，终于盼来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永川支左小组给红旗派发枪发弹。当时，我们只知道上级批准永川支左小组给我们发枪，直到一九七零年十一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北京京西宾馆七人会议，才弄清楚给红旗派发枪发弹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成都军区党委，遵照毛主席要武装左派的指示，根据中央武装造反派的文件，打报告请示中央，要求武装永川红旗派的，是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准的。

.....

1967年8月15日上午，江津军分区姜司令员召集“红革会”头头孙尔惠、李启成、冯继枢、肖向东、涂功谋、周光德和红化工的张惠勤、叶大明、丁春熙等人，宣布发枪重要规定：

- 一、枪一定牢牢地掌握在工人左派手中；
- 二、首先武装工人造反派；
- 三、组织好班排连队；

---

<sup>1</sup> 张甦《我们与万县》，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页。

四、凭持枪证发到个人负责保管；

五、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武装的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山大王，更不是草头王。我们是人民的武装队伍，正式命名为：川东民兵师。川东民兵师是属于永川支左小组的领导和指挥的，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擅自行动，否则支左小组有权对其进行处分，并收回枪支。

姜司令员重复地宣布：我们这支人民的武装；“川东民兵师”直属永川支左小组领导。一切行动听从支左小组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支左小组副组长李治平和“红革会”头头们研究决定发枪单位的名单。首先发枪的单位有永川化工厂一个团，永川发电厂一个连，汽车二十五队一个连，通用机械厂一个连，柯百里的 6761 兵团一个连，县工交系统帅文三个连，地区工交系统钟本西三个连，唐文斌、谭时强红卫兵一个连，地区川剧团和红司一个连，地区机关中干发给一个排武器作为自卫之用，因此，地区不少局处级干部背过枪，有的上过武斗前线。“红革会”参谋部指定冉可乎、李兴礼两同志负责照名册发放枪支弹药。夜晚由 7784 部队负责将子弹从军分区武器库运到县百货公司仓库，枪支在武装部武器库就地发放。当时只发了四千多条枪，几十万发子弹。枪大部分是二战时期的三八式和中正式步枪，有少数苏式 7.62 口径步枪，两挺马克辛重机枪和十多挺歪把子轻机枪，还有几十支手枪，多数是二十响的驳壳枪……<sup>1</sup>

此后不久的 8 月 28 日，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的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省革筹小组组长、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在讲话中专门讲到了“武装左派”问题，他说：

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随便武装。需要武装的革命派必须有这么几条原则：(1) 武装的必须是左派；(2) 革命派手头的枪，只准自卫，不准进攻，不许拿枪去镇压群众，那是不容许的，只能是自卫的，决不允许进攻，不准去镇压群众；(3) 武装要按单位（一个

---

<sup>1</sup> 叶大明回忆录未刊稿电子版第十章第九节“永川支左小组武装红旗派成立川东民兵师”。

工厂、一个学校)来解决,不能跨行跨业,跨行跨业不行,那种武装搞法有危险;(4)武装起来的单位,即革命派必须绝对听从调动,听从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员调动。在成都来说,要绝对听从警备司令部的调动,服从指挥;(5)必须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解放军要派人去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必须是这样,要有这么些条件。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就不能武装。<sup>1</sup>

张国华这里所说的“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几天”与“两个”都只是概略的说法。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这次“武装左派”(即武装造反派)是“经中央批准才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中央高层对“武装左派”应怎样具体操作尚有争议,还是毛泽东本人对此考虑尚需推敲斟酌,当时并未作为“最新最高指示”公开发布<sup>2</sup>,“代表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社论之类重要文章里也均未提及“武装左派”,只是在民间流传的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讲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sup>3</sup>但讲话中的这一内容后来在1967年10月19日以中发[67]320号文件正式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中被删除了。

不过,“武装左派”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就不能不在公开文件中留下一点踪迹,在1967年8月25日以中发[67]274号文件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有这样一节文字:“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在这里,除了增加一些限制性条件外,还把“武装左派”改成了“武装革命群众”这一更加宽泛的说法——大概这时已经发现在群众组织中分出“左派”(相对应的必然就会有“右派”),与国庆节前公布的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最高指示”中有关“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精神相冲突了。

后来在1976年3月3日中央发出由毛远新整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其中谈到文革中的武斗

<sup>1</sup> 《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蓉城快报》第一期,1967年9月出版。原件为铅印。

<sup>2</sup> “武装左派”当时应是作为“最高指示”在军内一定范围作了传达的。据当年四川省永川地区红旗派主要负责人叶大明回忆,1970年11月21日在京西宾馆解决永川问题会议上,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当着周恩来的面拿出1967年成都军区经中央批准向几个地方群众左派组织发枪的决定读给大家听时,文件开始就是“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爱护左派,支持左派,武装左派……”。详见叶大明《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记1970年底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载《昨天》第94期,2017年7月30日。

<sup>3</sup>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年8月9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时说：“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sup>1</sup>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说了武斗中使用的枪“大多数是发的”，证实了各地支左部队当时确实贯彻了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至于他所说的“发”，具体是指经过中央批准后发，还是指“抢了枪”当中的“大多数是发的”——即毛泽东和中央都清楚的“明抢暗送”？就可作不同理解了。所谓“明抢暗送”，即支左部队在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前来抢夺武器时不做有效制止，反而暗中提示何处存放有枪支，任其“抢”走。这是当时各地都有的公开的秘密。尽管8月初林彪就向毛泽东反映了对各地夺枪问题的担忧，但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却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反而还提出要“武装左派”，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明抢暗送”式的发枪并不打算制止，甚至还认为“打一下，也是个锻炼”。直到整个1967年8月都在“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全面内战”中过去，许多地方死伤惨重，如江青在次年的“三一五指示”<sup>2</sup>中说的“重庆打得稀烂”之后，9月5日，毛泽东才批准中央姗姗来迟地发出了时称“九五命令”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重庆和周边的涪陵、万县、永川、泸州等专区县市不同，那些地方的两派是从1966年底就已形成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而重庆两派群众组织都是明确的造反派——反到底派是从八一五派中分化出来的。若按重庆驻军的看法，八一五派才是“左派”，而按四川省革筹和成都军区看法，反到底派应算是“经受了考验的左派”。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哪一派都不行，都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批准，因此无法进行“武装左派”的工作。

于是，重庆两派就争相“自行武装”了。

## 两派都打开了军火库

### （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五节）

重庆文革中拳头棍棒的武斗升级为现代兵器的“战争”，与重庆有众多军工企业有关。

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就迁入和建立了一批兵工厂，在日本飞机不断进行大轰炸的严酷形势下，这些兵工厂的职工不怕牺牲，坚持生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革前开始的“三线建设”中，又经中央批准开始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到1967年底，除个别项目外，

<sup>1</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88页。

<sup>2</sup> 1968年3月15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时的讲话》，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1968年3月19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工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政治部翻印，1966年3月20日。

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第一批项目基本建成。”<sup>1</sup>生产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机枪的长安机器厂，生产高射炮的望江机器厂，生产坦克和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生产高射炮弹的江陵机器厂，生产枪弹的嘉陵机器厂和长江电工厂等，都在市中区和周边的南岸区（长江南岸）、江北区（嘉陵江北岸），有的与两江环绕的市中区只有长江或嘉陵江一江之隔。在文革武斗中，重庆这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器弹药库。这是重庆武斗规模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6月武斗全面开花并升级为“冷兵器”（棍棒、钢钎、石头等）大战之后，各大军工厂的两派力量对比大致是——

6月13日，嘉陵机器厂两派武斗，砸派（反到底派）占领厂办公大楼和生产区。八一五派武斗人员撤到重庆大学，五天后由八一兵团新组建的野战部队护送回厂，占领厂家属区和职工医院。双方对峙到8月13日，八一五派全面反攻赶走反到底派。

6月20日，望江机器厂砸派（反到底派）占领全厂。

7月1日，建设机床厂砸派（反到底派）占领全厂生产区。

此时长安机器厂砸派（反到底派）控制了全厂老厂区的要害部门和主要生产车间，八一五派占据着地势较高的新厂区，两派对峙到8月4日晚，在江陵厂反到底派的炮火支援下，长安厂八一五派被迫撤走。

7月4日，空压厂八一五派占领全厂。

7月20日，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赶走反到底派，占领全厂……

发生在长江电工厂的这个“七二〇”事件，是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八一五派统一组织八一兵团的重要部署：因前去该厂提取枪弹的人遭到反到底派的阻拦，该厂八一五派也不便当着反到底派的面让外人提走枪弹，便决定赶走反到底派以扫除障碍。第二天，7月21日，八一兵团即从该厂一次提走半自动步枪子弹72万发。据领导这次行动的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阳增泰说：这批枪弹“据说可供解放军装备一个师一年之用”。<sup>2</sup>阳增泰回忆：

7月21日晚上，我亲自出马，再次去长江厂提子弹。这次调动了三艘船：

401号，装港口兵团67人，机械兵团22人，石油校大庆公社70人；

101号，装三中抗大兵团和纺织兵团部分人员；

601号，装八一兵团35人，石油校石油兵团86人，五一技校78人。

三艘船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朝达带队，乘坐601号到铜元局，佯攻反到底军工的广播站，声东击西，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我亲自带领401号直奔长江厂仓

<sup>1</sup>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303页。

<sup>2</sup>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8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库所在码头。因当时既无手机又无电台，就由 101 号来回对两边进行联络沟通。

我们的船靠岸后，上去的人说有两个民兵挡住不准进库房。我就走过去对那两个民兵说：“伙计，你们辛苦了，你们暂时靠边休息一下吧！”并叫几个人把他俩看起来，不准乱说乱动。我们船上的一百多人立即拥进仓库。管仓库的人已经得到该厂八一兵团头头的通知，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把仓库门打开，给我们指明了建设厂提货产品的堆放处。

就这样，大家一鼓作气，把堆放的 400 多箱 70 多万发子弹全部搬上了船。<sup>1</sup>

这些枪弹是为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配套生产的。但是建设厂的生产车间和成品库房却已经被反到底派抢先控制。

“七二五”工业校武斗发生时，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反到底派的统一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正在重庆医学院召开会议，准备贯彻两天前国防工业系统两大派已经达成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讨论如何上缴钢钎、匕首之类“凶器”——当时两派武斗所使用的还只是“凶器”而不是“武器”。

会议进行中，突然闯进几个年轻的武斗人员，紧急报告了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的消息，与会人员大为震惊，整个会议议程立即改变。

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22 岁的望江厂车工邓长春提议“发枪自卫”。勤务组成员经过一天多的激烈争论，最后，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九个常委中，嘉陵机器厂王世伦缺席——奉命带队参加警司组织的全市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示威游行去了，到会八个常委中只有双溪机械厂董源河一票反对，其他常委一致同意，通过了向下属成员组织发放军工厂成品枪支的决定，每个赞同者都在邓长春当场手写的一纸决定上郑重签名表示承担责任。

这是重庆武斗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决定。

7 月 27 日至 28 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的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空压厂八一五派将坦克开出厂，到杨家坪街上示威……

当时的形势是，生产枪、炮和炮弹的工厂主要由反到底派控制，而八一五派主要控制了生产坦克和枪弹的工厂。因此，在常规武器的使用上，反到底派占了上风。重庆军工厂生产的一些现代化武器，当时主要是用来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其中不少新式武器连解放军的野战军都还没有配备，就被用到了重庆大武斗中。

对反到底派的武器优势，当年重庆民间曾有过这样的笑话：反到底派使用的现代化武器中，有用于海军舰艇上的二管或四管连发高射机枪，民间俗称“海二

---

<sup>1</sup>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87 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 年版。

连”、“海四连”。有的老头弄不清楚什么“海二连”、“海四连”，在喝茶聊天吹牛时，就想当然地吹嘘说：毛主席支持反到底派，看到反到底派得不到重庆的军队支持，就派来了海军二连人，后来看二连人力量不够，又派来了海军四连人……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得到驻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就开始从部队手里“抢”枪。这种“抢”，当时被称为“明抢暗送”，即部队并不加以有效的制止，有的甚至还会对来抢武器的人暗示武器的存放地点、通往路径等等。这种现象，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因此毛泽东和中央也都十分清楚。

7月28日，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下午和晚上两次抢夺沙坪坝区武装部各类枪械、弹药。抢夺武器之风迅速蔓延到全市各区县，从这天到次日，市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北碚区5个武装部的民兵武器、社会枪支、公安武器均遭八一五派数次抢劫。

与此同时，八一五派还严密监视着反到底派从建设厂向外运送枪支的情况。因当时电话联络都要通过总机转，而处于军管之下的重庆市电信局总机基本控制在八一五派人员手中，所以反到底派的一些“领枪”信息被八一五派窃取。1967年8月3日，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一批武斗人员到建设厂领枪后乘车返回南山途中，在黄葛桧新市场三岔路口处遭事先得知消息的八一五派伏击，当场打死10人（其中有在附近玩耍的小孩无辜中弹死亡2人），打伤十多人，俘虏24人，新枪全被夺走。长安厂的军工井冈山人员7月底和8月中到建设厂领枪后乘车返厂途中，两次在浮图关附近遭到八一五派伏击，前一次被打死1人，后一次被打死6人，所领枪支全被劫走……

控制了重庆市公安局的八一五派在局办公大楼等处修建了武斗工事，动用了公安业务用枪若干支及步话机……

重庆两派武斗从此进入真枪实弹的现代化战争，时称“八月战争”。

## 两败俱伤的北碚“八四”事件

### （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八节）

就在市中心发生财贸俱乐部“八四”事件的同时，在北碚区也发生了另一起死伤更为惨重的“八四”事件。

北碚区的“八四”事件发生在北碚蔡家场附近生产矿山炸药雷管的845厂。这个厂当时由反到底派控制。

在前一天，八一五派的北碚捍红总部派出六辆卡车到重庆城里找革联会要了一批半自动步枪子弹，运回北碚途中，在离北碚不远的三溪口红旗煤矿附近遭到反到底派截击，被打死一人，六辆卡车被扣下停到了845厂操场坝子里。可是八一五派拉回的子弹是装在空汽油桶里的，反到底派并不知道那些桶里是子弹，因

此没有去动汽油桶。

北碚捍红总部得知此情后，迅速决定于8月4日出动大批人马前去攻打845厂，本意只是要夺回那些车辆特别是车上运回的子弹。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行动竟让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伤亡。

反到底派知道抢了八一五派的车队，定会遭到报复，因此加强了对845厂的防守，特别是由驻北碚的军事院校成字302部队的红总（红色造反总团）派了三十多名武装人员到845厂参加护厂。302部队据说是培养驻外武官的机要学校，该部队与西南师范学院相邻，深受西师八三一的影响，因此反到底派的红总占优势。

845厂毕竟只是个小厂，八一五派进攻者人多势众，从清晨打响后，很快就占领了厂区。

然而，八一五派的胜利是以惨重损失换来的：冲在最前面的西师附中“无产者造反队”，是北碚八一五派中学生里一支最强悍的队伍，当场被打死主要负责人胡明富等5人，其中包括胡明富在内的三人为造反队勤务组成员，一人为支队长，因此成了“无产者”最惨痛的一天。胡明富等人大多是被从身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据当时在胡明富身边的亲历者回忆，最初胡明富发现背后有子弹飞来时还以为是自己人在乱开枪，还在痛骂，说回去找捍红总部算账。几十年后，才有西师附中反到底派的一个学生在同学会时给大家讲了他所知道的这一事件真相。

西师附中反到底派组织叫“布尔什维克”，据说是他们看到八一五派组织叫“无产者”，就说无产者要受布尔什维克领导，便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这位“布尔什维克”成员在1968年武斗再起时已经厌弃武斗，回到了长江下游的万县市老家。当时反到底派在万县市设有一个西师八三一的联络站，他就住到那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当时三峡没有夜航，所有往下水航行的船，都要在万县停一夜。有一天，一个解放军跑到联络站来问，你们是831的联络站吗？有没有西师附中的人？有人指着我说：有，他就是。来说他是302部队红总的学员，是我们一派的，要找西师附中的人说个事情。他们要比我们大一两岁，初中毕业后，当了一年兵，掌握基本技能以后，保送到部队，作为外交武官储备，他们学校是绝密学校，他们参加武斗也分两派。他找我的原因是要给我说明一件事情，否则以后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了。他说：你们学校胡明福等五个人是我打死的——我想这种事情也没有谁会平白无故地往自己身上揽的。他说我现在不说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前天，总参谋部派了个将军到我们学校来，把我们两派集中起来学习，批评了我们。说我们是绝密学校，以后做的是绝密工作，文化大革命一

来，你们就冲到社会上去，搞得一塌糊涂，整个窝子都被别人给端掉了。把他们痛骂了一顿。然后宣布，今天下午讨论我的讲话。第二天上午开会，宣布分配方案，不管你是那一派的，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也不管你老汉是个什么职位，武汉军区 50 个、成都军区 50 个、昆明军区 50 个……名单一宣布，下午就打起铺盖卷，后天上午就走人。一天之间，就把他们全部分配了。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西师附中的人，说清楚这个事情，否则以后你们不晓得这几个人是谁打死的。他是分配到武汉军区的，所以坐船经过万县市……

八一五去攻打 845 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参加护厂。那天他正好拉肚子，大楼里面的厕所遍地污水不能下脚了，他就提起枪，到外面去找个厕所。刚进厕所，警报响了，八一五打进来了。他还是有一些实战经验的，没有乱跑，就蹲下来观察，他发现火光和探照灯中间，有穿着红色运动衫的人冲上来了，推进速度很快，马上就会到达他住的那栋大楼前面了，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他想如果我再不开枪，后面的人一上来，我就会被他们包围起来。这时，他顾不得脏和臭，就把枪架在尿槽上面，从侧右方向朝他们开枪，打死了五个。他说全部是你们学校的，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胡明福、潘万森他们五个人。打死以后，就听到哭声一片，趁着抢救伤员的混乱时机，他就赶紧撤退了。<sup>1</sup>

而反到底派驻 845 厂协助护厂的 302 红总的吴鑫忠等十余人也在“八四”事件时被打死。据后来曾任反到底农总司勤务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蔡家场农民蒋良知说，他在头天晚上睡在 845 厂一反到底派朋友处，次日枪响后与朋友一起撤离，等到八一五派撤走后，他们又回到厂里，看到吴鑫忠等人是被捆绑着手打死的，因此认定是被俘后杀害的。<sup>2</sup>302 红总遭此重创，在此后的重庆武斗中再无大的作为。

## 八一五派攻占嘉陵机器厂

### （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十一节）

在八一五派攻打市中心“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交电大楼毁于大火的同时，1967 年 8 月 13 日拂晓，两派又在主城区的北边为争夺嘉陵机器厂展开了另一场大战。

嘉陵机器厂是当时重庆主城区八大兵工厂之一，位于嘉陵江上游的沙坪坝区双碑。1967 年两派武斗开始后，该厂反到底派力量较强，占领了厂办公楼和生产区，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先是撤到重庆大学，后在驻重大的八一兵团野战部队支

---

<sup>1</sup> 杨免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口述。

<sup>2</sup> 蒋良知 2011 年 9 月 1 日口述。

援下打回厂去，占据了厂家属区的一部分和职工医院。

1967年8月9日，八一五派革联会作战司令部由阳增泰主持在师专召开会议，主要由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专事校外武斗的“301部队”政委吴庆举分析形势，阳增泰回忆：

吴庆举在发言中提出：我们现在武器不行，大多是抢武装部的老套筒，而砸派那边主要是半自动，火力比我们强，我们虽然手中也有127、145机枪，但是缺少子弹。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把嘉陵厂打下来，解决127、145机枪缺弹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弥补我们在武器上的缺陷。

当时，在重庆市内的八大兵工厂中，长江电工厂是与建设机床厂配套生产半自动步枪子弹的，嘉陵机器厂是与长安机器厂配套生产机枪子弹的。长江厂现在被我们占领了，但我们有弹无枪。嘉陵厂的生产区现在被反到底派占据着，我们若不争夺过来，我们从长安厂得到的机枪也会因缺少子弹而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会议听了吴庆举对形势的分析后，经过热烈争论，都同意了吴庆举“打嘉陵”的提议，特别是二钢最积极，袁金梁兴奋地大叫：“只要打嘉陵，我二钢拿出十万元作后勤开支！”

最后制定出一个“三面包围嘉陵厂，拔掉钉子，打通沙区到北碚路线”的计划。<sup>1</sup>

会议上推选吴庆举为攻打嘉陵厂的前线总指挥，前线指挥部设于邻近嘉陵厂的102钢厂（即特殊钢厂，俗称二钢），二钢八一五派的主要负责人袁金梁是个老工人，中共党员，后来还以工人造反派中的中共党员身份出席过中共“九大”。

八一五派的攻击部队于8月12日深夜部署完毕，13日拂晓发起总攻。

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的武斗指挥李鲁沂是个20岁的青年工人，此前已经率部分武斗骨干乘坐嘉陵一号运输艇加入邓长春组建的“军工井冈山舰队”，经“八八海战”去了杨家坪（不久李鲁沂在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协助防守制高点时阵亡），嘉陵兵团另一主要负责人、27岁的青年工人王世伦，既不热心武斗，此时又不在厂里，而是作为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长在设于重庆医学院内的军工井冈山总部值班，厂内缺乏有力的组织指挥，反到底派人员全凭着武器好，火力强，才使八一五派迟迟难以推进。吴庆举下令调来三辆坦克作前锋，才一步步拿下进厂大门左侧的制高点，随后又拿下厂内水塔制高点，逐步向厂内其他地区推进。

水塔制高点当时的守卫十分顽强，火力很猛。事后才知道，在那上面守卫的

---

<sup>1</sup>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11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是一个名叫黄银成的 40 岁的司机，中共党员。他一人朝三个方向使用三挺机枪开火，让进攻者难以接近。最后进攻者从后面搭人梯爬上去偷袭，从背后将他打死，才拿下了水塔。

反到底派防守人员虽然拼死抵抗，但毕竟势单力薄，在八一五派的猛烈进攻下难以固守，不得不从厂后山下抢渡嘉陵江撤往对岸江北区，那里是反到底派的“解放区”。

当时重庆大学师生中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反到底派组织：重大井冈山公社。他们根本无法在校内立足，人员流亡在外，有十几个同学住在嘉陵厂，撤退时他们都跟着军工嘉陵兵团一起撤退了，只有一个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炼钢专门化 67 级二班学生辜习荣自愿留下来为大家打掩护——因他是同学中的中共预备党员，在面对危险的时刻，“共产党员，上！”这个从小就通过电影、小说及各种政治宣传中形成的观念，促使这个 23 岁的大学生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

最后看到辜习荣的是嘉陵厂工人、嘉陵兵团成员杨维富，退伍的前解放军部队“五好战士”。杨维富正要到厂后的制高点挂榜山上去掩护大家撤退，那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防空工事、战壕。杨维富告诉笔者：“辜习荣是替我死的，本来应该是我死在那里。”当时辜习荣对他说：“你是工人，还要为国家创造财富，你赶快撤，我来掩护。”杨维富不听他的，认为自己是退伍军人，应该由自己来打掩护，坚持要上山去，辜习荣见劝说无效，便用枪指着他，逼他撤走，杨维富相信他不会开枪，继续往山上走，辜习荣情急中掉转枪口指着自己的头说：“你不走我就打死自己！”杨维富见他态度如此强硬，只好撤走了。

辜习荣独自在挂榜山上以一挺“127”高射机枪（发射 12.7 毫米口径子弹）和几支半自动步枪掩护大家撤退。最后在进攻者密集的火力中受伤，被包围上来的八一五派三十二中“四野”的学生乱枪齐发，身中七弹身亡。<sup>1</sup>

如果是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辜习荣这样无私无畏的表现一定会被作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可惜他生错了时代，登错了舞台，他面对的不是外敌，而是自己的同胞，是为着同一个领袖、同一个理想而战斗的“革命造反派”，指挥进攻的是他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的校友——担任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的吴庆举，文革前是重庆大学机械系机冶专业 67 级二班学生，校文工团乐队队长、二胡演奏员。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吴庆举和辜习荣本应就在这一年同时毕业，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分别成为机械制造或冶金工业的技术员，以后晋升工程师，再以后在校友会或者校庆会时欢聚一堂……

大战结束后，疲惫不堪的吴庆举乘坐坦克下山返回学校去了。辜习荣和其他

---

<sup>1</sup> 何蜀《为了不应忘却的 27 个同学》，载《昨天》第 35 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死者的尸体是什么时候、由谁收殓的，不得而知。

八一五派如愿以偿攻占嘉陵机器厂全厂。自此，重庆两大枪弹厂均在八一五派手中。

据史志记载，这次大战“双方直接参加人员 500 多人，参与人员上万，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及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 357 万元”<sup>1</sup>。

## 关于重庆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多发炮弹” (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十五节)

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记叙中，有过“一夜打了一万多发炮弹”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写进了正式出版的官修史志。在《重庆市志·第一卷》的“大事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9 月 1 日 周恩来总理听到重庆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 1 万余发高射炮弹的消息时，痛心地说：“在越南 1 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sup>2</sup>

文中“我想了是很痛心的”系原文如此，估计是“我听了……”之误。

这个“一夜打了一万余发炮弹”的说法，实际上最早的出处是 1967 年 8 月重庆大规模武斗“八月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一次讲话。

梁兴初因与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意见不合，在当时四川省革筹组的四人领导班子中感到孤立，于 1967 年 10 月下旬自行跑到重庆，住进五十四军军部，公开表示与张国华和张国华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在“支左”问题上相反的意见，形成当时四川的“第二中心”。11 月 2 日下午，梁兴初由重庆驻军领导人陪同，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接见反到底派代表，包括工总司、井冈山红卫兵、机关司令部等组织头头二十三人，对反到底派进行严厉的训斥。梁兴初在讲话中有这样几句：

梁：我给总理在北京汇报了，说重庆一天打一万多发炮弹，总理说：真是败家子。当然不一定是你们打的。（白副军长插话：你们打得多一点。）

（蓝政委：李木森，江陵厂打了多少炮弹？李答：打了三至四千发，没有统计。）

（韦军长：望江打了一万多发。）

<sup>1</sup> 《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410 页。

<sup>2</sup> 《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411 页。

梁：把这么多炮弹拿到越南，可打下三百六十五架飞机。结果你们把炮弹浪费了，这不算败家子？<sup>1</sup>

从以上资料记载可见，关于重庆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多发炮弹”的说法，最早出自梁兴初的讲话，但讲话中并没有明确说是在什么地方、哪次武斗中打的。在上引史志记载中说是在空压厂，而在当年的梁兴初讲话记录上则通过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之口说是在望江厂，显然是矛盾的。在1967年8月的大规模武斗中，给重庆居民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一夜之间”打炮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应是1967年8月14日夜里反到底为给八一五派的“八一五造反一周年”纪念活动“献礼”而从江北区向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及沿岸的二钢厂、重庆大学等地进行的彻夜炮击。当年亲自指挥这场彻夜炮击的反到底工总司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回忆说：

后来说重庆武斗一晚上打了上万发炮弹，那是不切实际的过分夸张，我们每次用炮车拉一车炮弹去，有时是三十箱，有时只拉二十几箱，一箱二十发，每次一车炮弹都没有用完。<sup>2</sup>

后来在1968年中央召开的强行终结工矿企业工人造反运动的“八一五会议”<sup>3</sup>期间，9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的讲话中，周恩来、江青等人与重庆高射炮厂（即望江机器厂）代表有这样几句对话：

江青：你们打了多少炮？

总理：总数加在一起两万多发。（林兴礼：我们没打。）

总理：他们打的多，你们也打了一些。

江青：一炮也没有打，敢保证？（林兴礼：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没有炮。）

康生：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sup>4</sup>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没有再说“一夜打了一万多发”，而改说了“总数加

---

<sup>1</sup>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在听取反到底代表汇报时的插话记录》，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政治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油印资料）。

<sup>2</sup> 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8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sup>3</sup> 详见何蜀《“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载《昨天》第108期（2018年3月30日）。

<sup>4</sup> 《中央首长对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出版。



在一起两万多发”，显然是他也意识到前一说法不可靠。试想一下，如果“一夜”按 10 小时算，1 小时 60 分钟，10 小时 600 分钟，要打“一万多发炮弹”就必须平均每分钟打 20 发左右，也就是平均 3 秒左右就打一发炮弹才行，还得一整夜十个小时中连续不停地开炮……可能吗？

那么，“总数加起来”这一说法仍不明确：到底是多少次或多少天、多长时间段内的总数？对此，另有一则资料可作为参考，那是在 1970 年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里，曾任四川省革筹组办事组组长的郭一民，在奉命揭发批判已经被中央当作四川动乱的罪责承担人抛出的刘结挺、张西挺的发言中说：

8 月份重庆武斗升级，达到最高峰，一个月内打了一万多发炮弹。<sup>1</sup>

这个说法看来更合理些。

---

<sup>1</sup>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发言之四·郭一民：愤怒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武斗，大反人民解放军，营造独立王国的严重罪行》（中央学习班铅印材料）。